THE OBSERVER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七年三月十三日　・每份售二萬五千元

第四卷　第三期

專論

讀「自由主義宣言」　潘光旦

憲政和中國文化　郭叔壬

論聘請外國教授　季羨林

外論選譯

和蘇聯相處之道　拉斯基

報告

在荷澤解放區所見（下）　江沙

觀察通信

和謠與戰局（觀察專稿）　觀察記者

北望滿洲（觀察專稿）　觀察記者

共軍在陝北陝南發動攻勢（西安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週末闢欄

無獨有偶　費孝通

文藝

論神境　曹覺民

敬悼甘地先生　陳夢家

編者報告　編者

發行者：觀察社

社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報掛號：590027

訂閱價目

（三個月）

平寄：二十五萬

掛號：三十萬元

航平：三十六萬

航掛：四十萬元

郵資漲價・請補繳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觀察合訂本

第一卷上冊　有售

第一卷下冊　有售

第二卷上冊　有售

第二卷下冊　有售

第三卷上冊　有售

第三卷下冊　有售

售價：每冊三十萬元

郵費：掛號每冊五千元　航掛每冊七萬元

廣告價目

封底套色二千萬元

普通：全面一千八百萬　半面一千萬　1/4面五百五十萬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五千元

掛退：附郵一萬元

航退：附郵一萬元

航掛退：一萬五千元

如欲退稿・務請附郵・事後函詢・不易查覆

定戶注意

查詢務請註明定單號碼，否則無從查復。

讀者投書

人民何辜！

編者先生：我鄉浦東川沙，離開上海祇是一江之隔，然而那裏已成黑暗世界。近來因政府抽丁緊急，鄉保辦事人便乘機橫徵暴斂。我家所屬曹路鄉，當地主持者於徵收壯丁安家費時，曾舉行會議，議決十八歲至廿歲者繳米三斗，廿一至卅歲者收米六斗，卅一至四十五歲者收米三斗。現在已在徵收了。據他們自稱，每甲至少收米五石。我們一保共十五甲，就可以收到七十五石。而此次所徵壯丁本鄉三十人，計每保出二丁，安家費每丁得米十二石，則一保中只要廿四石便足夠了。但是他們收了三倍多的數目，這是什麼道理呢？如果不繳，他們便當你強戶，一切橫暴手段都會拿出來。一般鄉民懾於他們的淫威，都敢怒而不敢言。然而在這米價騰貴的時候，一家如有二三個男子，便要拿出一二石米來，怎樣有這力量呢？退一步講，這七十五石米如果都能交給征屬，那還說得過。其實照歷來當地幾位鄉保長辦徵丁情形看來，征屬所得，微乎其微。他們收米是要一次收足，而付給征屬是延宕幾月，零零碎碎的發給。征屬們哭哭啼啼去討，他們才像給乞丐一般佈施一些。而在繳費時，往往說得很好，說每個征屬可得若干，而結果却不足半數。苦的是一般平民，經手的却是舐飽了民脂民膏。又據東區友人說起，在他們那邊，往往半夜捉丁，捉了去便藏起來，不令家人見面，須得挽人說情，至少化掉十石八石米，方能放出來。當地人民被捉而無力贖回的，高當投環，妻子蹈河，慘劇時有所聞。這樣內戰不息，一年數征，人民何辜，遭此浩刼。難道當局者完全茫無所知麼？像這樣抽去的壯丁能付託他們「戡亂」的使命麼？我們目覩家鄉這種慘況，不忍默爾，所以寫下一二，希望能引起當局注意，有以改善。

宋×× 三、四、上海

部會的裁併

行憲後的行政院組織法，已經國民政府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修正公布，施行日期，將另以命令定之。我覺得第三條所列各部會，尚有商酌餘地。我主張社會、糧食、水利等三部，可以撤銷，其業務分別併入內政、國防、財政、農林等四部。具體的說：社會部的民衆組訓和社會福利（包括社會救濟），可併入內政部，加一司或二司。勞動局亦可歸屬內政部或工商部。糧食部的軍糧業務，可劃歸國防部或後勤總司令部。田賦征實可歸併財政部。糧食增產可歸併農林部。糧食管制，大可不必，反正管制的結果，徒使老百姓叫苦。至於水利，亦以歸併農林部較妥。都可分別加司加廳或設局。如是則農林部亦非「請客」之部了。

楊紹舜 一月廿八日 上海

兩廣考銓處

編者先生：銓敍制度的推行，是確立健全的人事制度的途徑，銓敍制度辦得好，行政自然會上軌道，法治的精神也可因此實現。但是，眞覺遺憾！我等因爲太信任銓敍機關，反而吃了一個大虧。去年初夏，我等在廣州的一個獨立學院服務，那時非常信賴銓敍制度，於是「守法」地在六月初旬將自已的學歷證件及以前一切的經歷證件，依照規定手續，逕往「銓敍部兩廣考銓處」辦理備用人員登記。我等在送辦的時候，本有些担心，深恐證件被就擱太久，但當時經該處經辦人確切地說：「兩個月發還原繳證件，五個月發給登記證。」得了這個期限，內心始不虞有他。殊知事實大謬不然。恰巧在送辦銓敍的兩個月後，我到了南京教育部，參加某種短期訓練，須繳驗學歷及經歷證件，時乃託人向兩廣考銓處「依期」索還原繳證件，據答：「尚未辦妥」。因無證件繳驗，我的事情受着重大的影響了。後來，又過了兩個月，我到了上海，服務於某教育機關，需用證件更急於星火，再託人歷向兩廣考銓處交涉領回原繳證件，又是一空，而我這邊的工作，也因之吃了大大的虧。直到現在，時間總共過了八個多月了，頃接友人自廣州來信，謂向兩廣考銓處，索還去年六月所繳的證件時，仍據答：「尚未辦妥」。爲什麼說兩個月完成的，就要拖到八個月尚未「辦妥」呢？這樣辦理人事銓敍，眞不知貽誤了多少「人事」！

鄧鉅經 楊承懋 裘文靜

讀者的感意（一）

編者先生：承先生於百忙中復示，欣幸無限。這裏我還有一個建議，貴刊經費不算寬裕，而定價較一般爲低，又不願接受讀者捐款，這種「不輕易受惠」的態度，我深表贊同，并致敬佩之忱。不過我有這樣的感想：一、我購閱其他書報，覺得花了代價，無所用感謝，但對貴刊却不然。閱讀貴刊，在精神上是一種高尚的享受，這種享受決非區區訂費——代價所可抵償。二、觀察在名義上爲先生主編，但如從遠的大的方面看，它却是屬於廣大羣衆的，應該讓羣衆來合力維護支持。我們熱切希望貴刊永恆保持特有的作風，特有的重點，開燦爛的花，結輝煌的果。因此，我建議先生在貴刊經費感到拮据見絀必然會影響到刊物本身時，先生應不拘小節，毫不遲疑，先向讀者提出。這一點我不敢說是代表所有讀者的意見，但我相信多數讀者必定具有同感。

萬× 二月十三日 上海

讀者的感意（二）

編者先生：時常有讀者表示，願意爲觀察捐點款，作經濟的支援。實際上，貧窮的讀者，又豈能奢言經濟支援，只是精神支援而已，而先生一再以公道的態度，拒絕接受讀者的捐款。這裏我提供一點意見。先生的公道，是基於取予的均衡，比方接受人家一萬元，必須付與人家價值相同的東西。但這祇是物質的形式的公道。在精神方面，同樣有取予之分。讀者的願意捐款，是超現實超物質的，願意供獻的是崇敬的景仰，是觀察先給讀者心靈的滋補，而讀者再給觀察的酬償，如果摒棄了這一份誠意，他們或將得不到安慰而感到空虛，或因熱情無所寄託而感到悵惘，如此，似乎也不十分公道。比較公道的辦法，先生應該接受讀者這份誠意。

一個人儘管如何的窮困，精神食糧與物質食糧，總是同等的重要，除非到餓死的階段。一切消費，可以儘量節省，而起碼的一碗飯與一本雜誌，是不可缺少的，我相信中國有靈魂的人，還不在少數，像觀察的售價，并不算貴，在一週間有負担一本觀察的經濟力量的人，也不在少數，所以觀察的價格的調整，應該盡可能的爲觀察本身的營養和健康來着想，不必過份攷慮到讀者的負担，因爲大部份的讀者，祇有一個希望，就是培養一個豐富完美的刊物。

包慶生 二月十六日 蘭州

編者按：謝謝萬先生和包先生的盛意。到我們實在不得已的時候，我們再考慮兩位先生的建議；本過我們總希望不要有那樣的一天。包先生信中最後一段，引起我們很大的感觸。我們過去總是盡可能的替讀者設想，可是近來銷路雖然增加，而經濟情形則每況愈下。這次增加到二萬五千元，我們不能不說很受包先生這封信的影響。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卽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四卷第三期
三十七年三月十三日

本期作者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郭叔壬：
季羨林：北京大學教授
江　沙：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曹覺民：湖北師範學院教授
陳夢家：清華大學教授

讀「自由主義宣言」

潘光旦

快一年以前的事了。去年四月九日至十三日，歐洲若干國家愛好自由的人士假英國牛津大學舉行了一次國際自由主義大會，發表了一個自由主義宣言，成立了一個『自由國際』。參加大會的人士的國籍有英、法、比、挪、匈、意、土、與、捷、芬、德、瑞士、瑞典、南非、西班牙、加拿大等。美國沒有參加的人，但大會鑒於它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國家，戰後的地位又特別重要，所以在閉會前推舉的一個臨時執委會裏特別爲它保留了一席。中國也沒有人正式出席，但有兩位記者被邀到場旁聽，一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駐英辦事處的朱撫松氏，一是大公報倫敦特派員黎秀石氏。我們最初知道這一回事，還是由於黎氏去年五月九日在大公報上的一番報導。

用了自由的題目來號召，來集會討論，來成立一種組織，來發佈一個宣言，以前在國家範圍以內是常有的事，其根據自由的理論而有政黨組織的國家，更可以說是比較常川的事。但國際性的這一類的活動，此番大概是第一遭，不由我們不加注意。國際自由主義大會，自由主義宣言，「自由國際」合成一個三部曲，其中最主要的一部自是宣言。宣言的文字並不長，只寥寥數百言，大體說來，是够得上『言簡意賅』的四字評語的。全文自有其章節，章節間並無小標題，大致可分爲如下的層次：引語、人權與人性、社會的基礎、各種基本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經濟、國際關係與合作、和結語。結語自然是相當於『凡吾同志，盍興乎來』的一個呼籲。

引言中說（引文均據黎秀石氏），『我們深信，世界之所以到這個地步（指混亂、貧乏、飢荒、恐懼），大部分的原因是自由主義的被人拋棄，因此在這宣言中重申我們的信仰』。重申兩字是與事實不符的。說過的話，再說一遍，謂之重申。在這宣言裏，眞正重申的話至多只有一半，其餘是修正與補充的話，重申、修正與補充的對象，不用說，是十八世紀末葉以來傳統的自由主義了。

修正與補充的例子是不一而足的。例如，說到社會的眞正基礎，個人而外，又添上家庭，這顯然是得力於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一部分社會學者與人文思想者的結論。又如，說到種種基本自由，於若干『自由』的覓取外，又兼顧到若干『不自由』的避免或革除；這很容易教我們聯想到羅斯福總統所提出的四大自由。又如，工具論的國家觀雖不算新鮮，此番宣言裏至少曾經予以强調，强調與重申也並不一樣。宣言裏說，『國家組織只是社會的工具，它的權力不可與公民的基本權利牴觸，也不得違反負責和有創造性的生活所必需的條件，』所謂必需的條件就指各種自由的獲得與不自由的祛除。又如，在關於經濟民主的各節裏，一部分的話是傳統的自由主義者絕對不說而社會主義者常說的，另一部分則是修正社會主義者的話；例如第一節說，『經濟自由如受壓迫，政治自由必隨之消滅。我們反對這種壓迫，無論來自國營事業、政府統制、或是個人壟斷、企業聯合、或托辣斯』。這裏面有採自社會主義的成分，也有修改社會主義的成分。最後，國際關係與合作的若干節裏也有一部分的話是比較新穎的，例如涉及所謂弱小與落後民族的一兩節。自由與民主要不出三方面，一是政治的，二是經濟的，三是民族的；經濟的自由民主至少應包括『免於匱乏』一層，而民族的自由民主則指自決與獨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的時候，有人很俏皮的說，根據這三方面的說法，世間還沒有一個眞正自由與民主的國家，英國有其一二而無其三，美國有其一三而無其二，蘇聯有其二三而無其一。兩年以來，局勢已頗有改易，這話適用的程度也隨而變動，三國之中，比較有進步的要算英國，近頃印度的自治與緬甸的獨立證明它在第三方面也有了幾分成就；這次大會選定英國做會場，眞不妨說是人地兩宜。無論如何，大會宣言所申說的自由主義，關於政治的三之一是舊的重申，而關於經濟與民族的三之二是新的補正；理論與實際的需要畢竟與十九世紀的不同了。

二十世紀版的自由主義比十九世紀的一版固然是訂正了不少，但猶有未足。我們願就下列的幾點再加商榷。

一、第一點值得提出的是主義兩字的名稱。普通說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我一向以爲不如說自由思想與民主生活（後者包括民主政治，民主經濟及生活的其它方面）。理由是主義二字教服膺的人易於趨於武斷，而其內容易於成爲教條。思想與生活標準的領域裏，主義的稱謂倒並不是絕對的不可用，不過要有兩個條件，就思想說，這條件是純理論的探討，就生活標準說，這條件是信仰與服膺必須是個人的，由個人自動的抉擇爲起點，以個人行爲的修飭爲歸宿。在就生活標準說教的人應恪守的原則是：說不說由我，信不信由你。但說到自由與民主，這兩個條件都不容易具備，特別是在這個一切要講求社會化與團體行動的時代。嚴格的說，純理論的思想是沒有的，但自由思想更不能以純理論的範圍來限制，它勢須影響我們對於日常事物的看法。完全個人的信仰也是沒有的，但民主的信仰更富有積極的社會意義，勢須影響我們日常行爲的做法。唯其與日常的看法做法不可分離，所以武斷、教條、與硬性組織的成分應力求其減少，而主義的名詞的避免便是減少的第一步。否則，執中無權，事同執一，也無非是在目前已有的種種深溝高壘之外，又添上一道深溝，一座高壘，徒使紛爭之局，增益其擾攘的程度而已。

不用主義的字樣，即所以避免所服膺的理論的偶像化，凡百事物之中，惟有偶像化的强制性最大與最牢不可破，而强制與自由是兩個相反的東西；由强制的方法來反抗强制，其過程與結果依然是不自由、不民主、是以暴易暴而不知其非。用這限度來評議自由主義者的集會與『自由國際』的創立，我們的毁譽是參半的。黎秀石氏在報導裏說，『自由國際這個名稱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共產國際或社會主義國際，但事實上……不同。它沒有煽動國際革命的野心，也不是各國政黨的大同盟。在牛津會議，各代表大都主張自由國際必須成爲一個超黨派的團體，它的野心不是直接爭取政權，而是謀求自由思想的復活。自由國際，與其說是一個政治團體，不如說是一種思想運動，較爲正確。』這是值得贊同的。但黎氏也報導到：『參與牛津會議的代表們無不激烈抨擊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他們看來，共產與社會兩主義都是集體的洪水猛獸。直接違反個人自由』。這就有問題了。大凡激烈抨擊一種東西的人，自己必有另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要打倒別人的偶像的人，自己必另有其偶像，自己必受此偶像的支配，自己必也不自由。我可以想像，這一班參加大會的人，大部分是自由主義者，而不是自由思想者，是民主主義者，而不是民主生活者，自己是大禹皋陶一般的聖人，自己的信仰是天經地義，別人與其信仰才成爲洪水猛獸，否則又何至於如是其深惡痛絕呢？西文 liberalism 一字的尾閭，即我們所稱主義也者，雖若比較平凡，其所得於情操的渲染者也不若我們的譯名的濃厚，但繩以大會中這一類的表示，也可知其已經日即於不平凡了。應該平凡的也不平凡起來，是時代的一個悲哀。

二、出席大會的人以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爲洪水猛獸，爲的是它們直接違反個人自由。這就引進到我們要商討的第二點。宣言全文中沒有提到個人主義一次都沒有，是妥善的，也未始不是對於傳統的自由思想的一個修正。宣言中又曾有過『社會全體福利至高無上』的話，這話本身的說法是否完全妥善，固然待考（另見下文），但由此可知個人的地位並非至高無上，那也是妥善的，與稱個人而不稱個人主義同樣的妥善。但宣言在開始時既有尊重個人……是社會的眞正基礎』的話，而大會討論時，代表們又會爲了個人自由，對共產與社會主義，大肆攻擊，可知至少在這些代表的心目中，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還是分不開的，以至於一而二與二而一的。這一層非再加檢討不可。

共產與社會主義，從個人主義的立場看，是洪水猛獸；個人主義，從共產與社會主義的立場看，又何嘗不是？惟其彼此以洪水猛獸相視，我們的世界才演成了今日的局面。自由思想者是根據了既明且恕的原則來養成他的看法與做法的，把別人，別的人羣，或別人所拳拳服膺的事物當作洪水猛獸，總是一種不明不恕的舉動，充其極勢必造成一個不兩立的局面，天下雖大，只能有我而不能有你。說尊重個人，是不錯的，但所以尊重之者，並不單單因爲他是一個人，與別的人有些不同的個性，不同的意義與價值，而也是因爲他同時有一個做人的共性，能與別人相通，於社會生活與文化生活，能共營共享，能對大家的禍利湊上一分，初不問這一分的精粗大小，方才所稱個性的意義與價值指的也就是這一分。所以與其說尊重『個人』，不如說尊重『每一個人的人格』。人格的概念有其獨特性，也有其社會性；人格的格字，如作一個人不同於它人的品性格局講，指的是獨特性，如作他應該努力上達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做人的標準或資格講，指的便是社會性。二者缺一，所發生的不是人格完整不完整的問題，而是人格的根本存在的問題。沒有了人我之異，就沒有人格，沒有了人我之同，以襯出人我之所以異來，也就沒有人格。通性之同與個性之異，社會的需要與個人的需要，對於人格的樹立與發展，好比輕氣與養氣之於水，缺一不可。這原是極單純的常識，要不是因爲近代個人觀與社會觀的各自成爲主義，以至兩不相能，是犯不着在此反覆申說的。總之，宣言中在此方面的說法，應當改正爲『尊重每一個人的人格，作爲社會的眞正基體』。基體的解釋見下文。

三、宣言說到社會的眞正基礎時也曾經把家庭列入。這是我們可以同意的，上文已稍有說明。不過與其說基礎，不如說基體，基體等於單位，或嚴幾道先生所創譯的么匿。基礎兩字失諸籠統，其間可以包括許多別的東西，例如地理環境，物產資源，國情民性、文化遺業之類。大凡一種有系統的東西必有其所由組織的基體，好比磚片石塊之於一座建築。社會所由構成的基體，上文所說的人格而外，就要算家庭了。同樣的承認人格與家庭是社會的基體，大抵哲學家與心理學家所特別注意的是人格，而社會學者自孔德與勒泊萊以降則是家庭。以哲學家的資格，而特別屬意到家庭的，依我所知，只有英國的人文思想家席雷一人。席雷鑒於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紛呶不已，曾經鄭重的把家庭提出來，認爲它才是人羣生活的眞正基體，同時他和許多社會學者一樣，也認定

唯有健全的家庭才可以把人格的特獨性與社會性的發展，兼籌並顧，從而於個人與社會之間，減輕其衝突，增益其協和。於此我們應該注意，這些作家所提出的是家庭，不是家庭主義，因爲他們充分瞭解，一稱主義，便成至上，結果是家庭制度的發展日趨畸形，不至把個人與社會吞噬以盡不止，即，兼籌成爲統籌，並顧成爲包荒，有如二千年來中國的形勢。這些我認爲自由思想者都不難同意，我個人歷年來也曾再三加以論列。至此更不妨指出，人格與家庭兩種基體是不衝突的，分別注重它們的人也從來沒有發生過爭執，大抵他們都看到，人格之所以爲基體者同時也是社會與文化生活的一個最終目的，即每一個人的得以各自發揮其最大的社會意義與文化價值，而家庭之所以爲基體者則爲於手段或過程一方面，個性的辨識與發展，社會性的啓迪與傳授，場合與步驟雖多，家庭無疑的是第一而最能生效的一個。

四、宣言中强調國家祇是一個工具，我們在上文也說到了。但我以爲還不够清楚，同時工具論的適用只限於國家一件事物，還遠不足以把自由思想的精神充分發揮出來。說『國家組織只是社會的工具』，那社會兩字便有問題。我們應當說，國家是人或人格的工具，在人格發展的總目的之下，國家、家庭、文化的種種方面，包括宗教在內，全是工具。個人的種切，包括一切身心品性，社會的種切，包括一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無往而不是所以完成每一個人的人格的工具。若說國家是社會的工具，則社會自身豈不是成爲目的，成爲至高無上，那參加大會的許多朋友又何必對社會主義大肆其抨擊呢？社會主義不就是以社會指做目的的麽？因此，我不能不疑心這一班朋友在思辨上還很欠工夫，思辨既欠明白於先，斯交代不够清楚於後。自由思想只有一個單純的目的，就是每一個人格的充分發展，其它宇宙間的一切掃數是工具，所以供人運用而達成此目的的。這班朋友不瞭解這個，所以在宣言裏，一則曰國家是社會的工具，再則曰，『社會全體福利至高無上』（見論經濟民主部分，上文亦曾一度引過）。殊不知所謂社會全體也者，好比全民、大衆一類名詞，是最不可捉摸的，凡屬不可捉摸的名詞必容易被人利用，成爲口實，古今中外，有得幾個野心家或野心的少數人不挾社會、全民、大衆之名以行其威福之實的呢？

工具論的適用只提出了國家的一種，顯然的是過於自畫。如果這一次集會、宣言、與國際組織的目的端在重申對於民主政治的信念，那還說得過去，但事實並不如此，這一番舉動的目的不止是民主政治，更是民主的一般生活，以至於更廣泛的自由的思辨，言論，和整個的人生態度。目的既如是其廣泛，則工具之論的適用，便應有一番包羅得更多的提示，有如我們上文所論。讀者於此，不妨參看英籍俄人宗教思想家貝蒂也夫所著的『自由與奴役』一書(Nicolas Berdyaev. Freedom and Slavery)，以資補充。貝氏以人格爲主，爲目的，以身外的一切事物，連同上帝與教會在內，爲賓，爲工具，進而把所有的工具逐一分析，以示其反客爲主與奴役人格之所在；在喧囂擾攘而人格被事裂的今日，讀去大有清涼一劑之感。

五、自由不宜稱爲主義，上文已加論列。但一面倡導自由，而一面，不作一番防閑的措施，即在人格發展的過程中，一個人應如何努力，不作一番剴切的指示，則自由依然可以走樣，而變成放縱與散漫一類的表示。工業革命以後歐美資本主義下的經濟生活與其反響，不就是最大的一個教訓嗎？草擬宣言的朋友們似乎沒有充分的接受這番教訓。宣言中爲了防閑自由的趨於自肆，只在經濟民主的最後一段話裏說到：『自由與服務必須相輔而行。有權利；便有相對的責任。如要自由的社會組織成功，每一個公民對他的同儕都要有一種道德的責任感，並要積極參加公衆事業』。

我認爲這話一半是錯的，一半是空口白說的。人格的自由，或自由的人格，決不是權利與義務的概念所能綑縛的，若定要加以綑縛，則我們也只能說，它是權利，也是義務，決不能單單看做權利。自由的人格是一個理想，不是一件現成的貨物；一件分有應得而偏偏有人霸而不與的貨物可以看做一種權利，但勢須痛下工夫、方能希望達成的一個理想，卻很清楚的是一種義務，爲了一己，必須盡此義務，爲了別人，爲了社會，也同樣的必須。看重權利，原是個人主義時代的一個通病，如今這一班朋友完全把自由看成了權利，足見個人主義的流毒未盡，而我在上文所下的評語，說他們把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混爲一談，是並非故入人罪了。這所論是說錯了的一半。

深怕自由成爲自肆，他們提出的對策是『服務』，是『對同儕要有道德的責任感』。我認爲這一半是空話，是呵熱氣的話，於事完全無補。基督教在西方，講了兩千年的愛、服務、與對同儕的道德的責任感，究竟有得幾許成效，我們不知道；但近百年來，它對於政治與經濟方面種種强凌弱、衆暴寡、富抑貧、大加小的事實，未嘗有一籌之展，我們是知道的。不講權利、但講義務、痛絕自私、昌言博愛的宗教的感召，所得既等於零，何況一無憑藉的口頭禪語呢？生前聚斂，死後捐錢，一面做强盜，一面發善心的『服務』與『責任感』，以前有，以後也不會完全沒有，但我們相信它和這一類的道學的勸告無干。而這在當事人看來，以至於草擬這次宣言的人看來，應該還無害其爲自由。

我說這種勸善之言爲一無憑藉而與自由人格的招致不生關係，爲的是想引進到本文中對『自由主義宣言』最主要的一個評論，就是，它根本沒有談到教育。在列敍各種自由權利時，宣言固然也說到『不論貧富貴賤，人人都可以盡其才能受各種教育的機會』。但這是老調，此其所謂教育並不一定包括自由思想者所瞭解的那一種教育。西洋自希臘時代起，便已揭橥過從自由思想出發的兩大教育原則，一是認識你自己，一是任何事物不宜太多，在太陽神阿普羅的神龕上，勒爲銘文，垂作明訓。說認識你自己，目的自是在控制你自己，希臘人是認定知行合一，能知即能行的；說任何事物不宜太多，指的自是和你生活有關的一切事物，你的欲望，你的情感，你的思考，你的理想，你的信仰。把兩個原則合起來，就等於說，你能控制你自己和你因生活而發出的種種企求與欲念，則所求與所得不至於逾量、過火，轉而使你自己被它們所束縛控制。不

[illegible]者忘記了。如果不忘記，而轉從這方面有所提示，使蔚爲一種教育的新風氣，則所得的人格自由便是眞正的自由，亦即無煩防閑、無須對策的自由。有了這種教育的作風，再進一步而講求達人與親民之道，即從淑身的生理與心理的學術進而致力於淑世的社會的學術，則不必侈談服務與責任感，而服務與責任感的效果不求而自至。

六、最後還有不妨指出而一時無須詳論的一點，就是，宣言中抽象的提示多而具體的主張少。黎秀石氏在報導裏也評論到這一層，特別是在經濟方面。在大多數人缺乏麵包的今日，少數人侈言自由的理論，而拿不出免於匱乏的切實的保證來，全部宣言即等於空口說白話，初不限於勸人發揮正義感與努力服務一端而已。充分的生產與適當的分配固然爲任何經濟主張所不可缺少，但欲望的各自控制也是健全的經濟主張所必須具備的一個條件。生產與分配屬於外緣，欲望的控制繫乎內發，欲望無限，而物力有窮，終須外內並力，兩相調協，經濟生活才有底定的一日。關於欲望的內發的控制，近代的經濟學，不論其爲傳統的或革命的，是幾乎完全不加論議的，自由思想者，根據自由生活的需要，有如上節所論，便應出而加以鄭重的補正。此外，自由思想者前途，也必須供給一個關於人口的主張，而這又須和經濟主張相提並論。物力之生產供應有限，而人口的增殖無涯，人口之中，對於一己欲望自動裁節的能力，自亦大有不齊，則此種主張，於注意人口的數量以外，更須顧到人口的質地，其於貪得無饜、嗜人自肥的分子，勢須運用社會的力量加以約制，不能任其孳長。一種宗教的主張也有它的重要的地位，西洋的自由思想者既從一種有組織的宗教的積威之下解放了出來，他自不願意看到後起的各種思潮信仰，包括自由思想本身在內，趨向於過度的組織化而儼然形成各式的新教條與新教會。他不但應主張信仰自由，更須主張信仰的返歸於個人化，使其成爲充實人格的一種工具，與哲學文學、音樂、藝術等人文學科屬於同似的範疇。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希望消除壁壘，增闢平陽，使自由的人格有位育的餘地。第四種具體的主張是教育的，上文已有申說。四者之中，最基本的是教育的，因爲，一則自由思想者自身要站穩，必須先經歷一番自我認識與自我克服的培養工夫，再則，要使種種主張發人深省，作爲見諸行事的張本，也總須以教育爲入手之方。

憲政和中國文化

郭叔壬

很久以前，就聽到梁漱溟先生和張東蓀先生，先後在「觀察」上發表過批評中國憲政，兼論中國文化的文章。有梁張兩先生文章的「觀察」最近輾轉自古巴朋友處寄來，始得一併拜讀。同時又看到谷春帆先生的「從民主到帝國」一文（觀察三卷十期）也是以行憲問題作爲討論對象的。這個問題一直是筆者內心裏橫梗甚久的一個問題。來美以後，因推敲事理的時間較多，復切實的看到此間人士的生活情態和物質文明，更加深了筆者對這個問題的思考。這個問題不僅是一個實際政治問題，而且是一個文化建設問題。讀了梁張谷三先生的文章以後，筆者也願就思慮所及，提出來和國內時賢商討。

梁先生在「預告選災，追論憲政」一文中，（觀察三卷四．五期），對中國的憲政前途根本否認，就梁先生數十年的研究結果，認爲從中國文化內容着眼，中國絕不能有英美式的立憲政治；因爲競選宣傳，和中國的民風國俗根本不合。梁先生又謂，民主政治在中國非不可能，但這需要審視中國的特殊環境，然後由專家學者，擬訂一套合乎中國國情的民主政治，設不此之圖，而硬要競選行憲，則一定要發生選災。張東蓀先生的文章，和梁先生的文章，在情調上相同，在精神上不同。張先生在「我亦追論憲政兼及對中國文化的診斷」一文中，（觀察三卷七期），認爲文化的吸收，要自彼此條件相同處着手，憲政政治在中國非不可能，惟中國之所以未能建立起英美型的憲政政治者，主要原因是，競選行憲，完全受特殊勢力所操縱，至如中國是否永久不會產生英美型的憲政，這是一個實證問題，目下難作斷論。谷春帆先生的意見，不同於梁張二先生。從歷史上看，工業的發展，促成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因時代的需要不同，故民主政治可以含有不同的內容。民主政治不是沒有缺點，它需要逐漸改善。中國目前的混亂似乎仍要乞靈於民治。三先生的立說大致如此。（此文並非想和三位先生論辯，而是想申述筆者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故三先生原文不擬引用。）筆者是大體同意谷先生的說法的，雖然筆者並不完全同意於達到結論的推理步驟。筆者深信，憲政政治也不外乎是一種生活情態，生活情態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體，所以憲政初行之際，不宜陳義過高，只要我們能有這個制度，則總勝過我們沒有這個制度。政治上的恩怨，本來不是一個甚麼制度的建立與否可以解消得了的，它牽扯的問題太多。但一個注意現實問題的人，就不能不針對現實，用其思慮。我們如果能够腳踏實地，就問題的本身想解決問題的辦法，則假以時日，這個制度總有一天會爲大多數國民所接受的。

從民主政治的發展上看，英美的民主政治是他們人民實際生活的產物，他們的民治精神，和民治內容，常因物質生活的改變而改變。筆者現居美國，即以美國爲例。美國各州後來通過的憲法，在精神上和聯邦憲法常有衝突，而後來因工業發展，而發生的一些問題，在聯邦憲法的條文上，竟找不到解釋。行

憲初年，政治的貪污，選舉的把持，眞是史不絕書。熟悉美國憲法史的人，熟悉美國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人，都知道這些事實。地方政府是美國民選政治的基礎，但一本討論美國地方政府的書籍，幾乎是一冊描寫政治貪污，選舉把持的歷史。地方政治機構的變遷，從市長制到市議會制，到市委員制，又到經理制，都有黨人竊權和把持選舉的牽連；而當年州級政府，對地方政府，在立法方面和行政方面種種控制，以及後來風起雲湧的地方自治運動，都有黨爭的背景，就連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員，也都牽連在黨爭之中。後來因爲黨爭的病民，所以許多城市，通過議案，採用市經理制，不惜重金，禮聘客卿，希望這位客卿，能公平的有効的處理市政。

遠在一八七七年，有文官制度改進協會的成立，但直至一八八四年，任用文官的考試制度，才正式實施，並明文規定，政府現任官吏，不能從事政黨性的活動。不過這種規定，只同具文。在黨政合一局面下，弄出來的選舉，那裏還能代表眞正的民意？我們不妨再來看一看美國目前政黨政治的運用情形。大體說，每個城市都分成若干區，區內設有黨部，在大城市裏面，區復分成若干保，每保多有三五黨員，執行黨部方面的工作。各保乃係黨方的基本組織，各保黨員籌組一委員會，由此委員會推選代表，出席縣中央委員會。縣中央委員會再推選代表，出席州中央委員會。復由之推選代表，出席黨中央委員會。但從各區選出的代表，是否眞够健全，就很成問題。因爲從區裏面選出來的人，常是有某種方便的人。一個稅務員，可以因了活動選舉而少課該保居民的財產稅。所以實際的民治，和理論的民治，很有距離。此外競選提名制，從初期的預選會制的間接提名，改變到直接預選會的直接提名，也都是因爲制度上發生了毛病，而不能不有所改革的。

遠者不論，就在美國民主政治業已大體完備的今天，在眞正民意以外，又有多少壓力集團，在那裏製造民意，刧持民意。而百分之百的「民主」，談何容易？但儘管如此，這並無礙於美國民主政治的推行。隨着產業的發展，以及配合產業發展而建立起來的教育制度，使美國民主制度的內容，逐漸充實。壓力集團操縱政治的情形亦逐漸改善。當日聯邦制憲諸公，所未能慮及的，而後來又和國計民生發生了莫可分解的關係的一些事件，又都循次的明載各州州憲，或是特別條例裏。企業組合的興起，壟斷市場。獨佔競爭的發生，都直接間接影響人民的經濟生活。雖有資本家的財力通天，但限制這些違反大多數人民利益的規定，則釀成了必須奉守的條例。羅斯福時代，又不惜以無比的努力，改革大理院，以便和解釋利於新政推行的聯憲。由於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教育機會的均等，人民的聲音愈來愈大；職業政客雖仍極活躍，但爲了競選，他不能不取悅於人民。一個熱中區保初選的私務員，冒着危險，低估被課者的財產，期得一票，這種事實，都仍不失爲「民主」的有力說明。時至今日，民主政治已成了英美人民全部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一個項目。不管這個制度本身上含有甚麼缺點，但從提高資本的邊際效用，發展私人的企業精神，以及人人皆有充份的信教自由……這幾點來看，這個制度仍爲絕大多數人民所信奉。所以演化到今「民主政治不但是美國人民的一種生活情態，而且已變成美國人民的一種精神力量。

以上敍述，筆者並非在故意指摘美國民主政治的毛病，而替我們自己的缺點加以辯護，而是說憲政的推行，我們不能期望成功於旦夕，我們更不能因爲有人把持，便根本懷疑這個制度的本身，而放棄了我們對推行這個制度的努力。認眞講，我們必須把這個制度的理想，貫注於我們人民的實際生活，濡染浸淫，使這個制度，能够變成我們文化的一部，縱有錯誤，我們可以不斷的修改，時間一長，自然有水乳交融的一天。美國先民遠來西歐，多富理想，其建立一個制度，尚須經過一二百年的努力，則我們推行憲政，想指日就理，豈是易事？但盱衡現勢，我們的問題就在這裏。

文化一詞的含義，原太廣泛，我們爲了行文的方便起見，不妨說，某個國家的文化，乃是指某一時期某一地域一羣人民的生活情態，及文物制度的內容而言。準此而論，則我們有我們的文化，英美有英美的文化，蘇聯有蘇聯的文化，因爲這幾個國家的人民，各自有其不同的生活情態，和用以推進這種生活情態的文物制度。但爲甚麼英美的文化就會產生英美的政治制度，蘇聯的文化就會產生蘇聯的政治制度；而我們的文化，就不能够產生一套能够用以推進我們人民生活情態的政治制度？這一定有問題，而問題的基因，乃在用以構成文化內容的思想和用以構成文化內容的生活，全部脫節。這一個看法的例證，不勝枚舉：我們談現代化，一開頭，就聯想到洋房汽車；談憲政，一開頭，就聯想到英美的民治。其實我們錯誤了。我們懸的不妨稍高，但我們也不能不認識我們自己，實在說來，現代化的主要內容，不外是一個人民頭腦的改造。是一種爲追求一個新的生活環境，而採取的一種新的生活態度。試問我們這種態度有沒有？而這種態度的成長，又需要相當時間的培養，如果我們沒有這種態度，如果我們人民的生活態度以及生活內容，不隨同加以改進的話。光是汽車洋房，能不能使我們現代化？英美式的代議政治，全部搬來，能不能在我們的文化裏生根？試看一輛汽車，要多少個附帶的條件？如同平滑的馬路、一定限度的行車速度、加油站、修理站、各種售賣汽車零件的商店、最基本的還是要有鋼鐵汽油的生產、以及一套足以保護汽車零件、不在停車處爲小偷盜竊的治安制度，我們如再進一步，看看汽車之所以成爲今日現代化內容的一個主要部份者，又豈是一蹴而幾的？單就汽車行業的發展，就可寫成一厚冊的美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八六二年，二十五歲的羅克非洛氏，到俄亥俄州，集資四千美元，從事煤油礦的開採，至一八七〇年，便增資到一百萬美元，開辦美孚油公司，自是以還，煤油乃得大量提鍊，用煤油作爲動力的各種工業，才得大量發展，而汽車業便也加速度的發展，於是福特大王，以及各式各樣的大王，遂應運而生，美國資本主義的內容，才愈益充實。

隨着產業的發展，加深了各種不同利益的衝突，進而又增多了代表各種不

同利益的團體，最顯著的南北美戰爭，是爲經濟利益的衝突而打的。提高關稅，和減低關稅的鬥爭，西方農業利益和東方工業利益的鬥爭，以及白銀集團和非白銀集團的鬥爭，這都是有耳共聞的史實。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此起彼伏，便常常決定於這些利益集團鬥爭的勝負。從這一點上，我們或可以看出，爲甚麼民主共和兩黨，在競選宣傳上並沒有陳義極高的主張，而僅是集中於某一些極其實際的問題的解決。

上面的兩個說明，是在解釋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民主政治的推進，全是建基於他們實際生活上面的。自然，人權宣言、盧騷學說，對美國立國精神，大有影響，但這個制度的實際建立，還是置基於他們的全部生活的。一部別克汽車，不知經過了多少設計，多少改造，才具有今日的規模，而我們一談到汽車，心中多少要有一輛一九四八年的別克作藍本，好像一九四〇年的福特，便已無足稱道。同樣，我們談工業化，談憲政，也總要以蘇聯或英美今日的成就爲底樣，我們竟忘記了他們幾十年，甚至幾百年，人民爲達到這個目的，所遭受的艱辛，以及所支付的代價。我們想一步登天，而不問問自己的慧根，豈不是思想和現實相距太遠？取法乎上，固然無可非議，但我們要度德量力，看看自己的條件，這種陳義過高，而不重實際的精神，就是我們民族文化的問題所在。這種現象，是有其歷史源淵的。據說孔老夫子，曾爲匡人所困，情急事迫，他老先生不求脫身之計，而竟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實這種腔調，去現實問題多遠？從孔子到孟子，到董仲舒，到韓昌黎，更到宋代諸儒，都具有這種傳統的態度。他們講辨義理，分辯道器，取法先王，稱道堯舜，其實堯舜之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們並不清楚，拿了一個內容並不清楚的東西，作爲立說立論的標準，這怎麼行？遇見讀書的人，大都犯了好高騖遠的毛病，所謂士先器識而後文藝的看法，是完全忽略了分工的科學原理的。蘇軾上韓太尉書，公認是一篇鏗鏘好讀的文章，其實是滿紙空虛，他說：「人之爲學，應志其大；不志其大，何學爲？」（筆者手頭無書，大意如此）我們如問，究竟學甚麼才算志大？時至今日，這種思路，一直還存在着。中國學生，和美國學生，就筆者所見，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一個國內經濟系畢業的學生，講凱恩斯的就業論，講張伯倫的獨佔學說，常頭頭是道，但並不很清楚二氏達到結論所用的那一套推理方法；而一個美國學生，常不大清楚凱恩斯張伯倫二氏爲何許人，但他能運用分析經濟所利用的那一套方法。

上述種種事實，都反證出在我們的文化領域裏，有着思想和現實脫節的地方，因爲思想和現實的脫節，所以我們未能用我們民族的智慧，建立一個推進我們生活情態的制度，圖治之道，就在如何縮短兩者之間的距離，使一切東西都變成我們實際生活的反映。

從上述諸點，我們可以看出，英美的憲政政治，乃是工業發展的果實，而憲政政治的推行，又幫助了工業的發展。同時我們又看出，憲政政治，僅是人民整個生活情態中的一個部門，其建立發展，與其它部門是相互關聯的，我們今後憲政的推行，能否成功，就全看我們對這兩點的認識如何。

自第一點言，處當今之世，不管一個國家的文化內容，包含一些甚麼東西，或是一個國家的文化型態，與另外國家的有甚麼差異，但必不可少的一個項目，一定是工業化。工業化程度的深淺，可以決定一個文化的是否充實，這個道理，如同一加一等於二，是無須辭費的。問題乃在我們如何促進工業化，更具體點講，就是我們如何促進發展工業化的條件。於此，英美蘇聯的成例，都可做我們的鏡鑑。但從中國的立國精神，和目前的實際政治環境看，我們接受英美的政治制度的可能，一定大於接受蘇聯政治制度的可能。就英美的情形看，伴隨工業化而來的，是工業階級的建立，商業階級的抬頭，和工廠制度的興起，我們如其不完全採蘇聯的辦法，一切經濟活動，完全由政府來干涉，則必像英美一樣，也產生各種不同的經濟利益。我們固然可以同時採用英美的放任制，以發展私人企業，又同時採用蘇聯的管制制，以發展國家事業，（其實單就經濟活動而言，這兩種制度已漸漸接近）惟無論我們要走那條路，工業發展的一些原理，我們是必須遵守的。我們想減低生產成本，就非大量生產不可；想爭奪市場，則非求生產品的花樣翻新不可。其影響所及，一定引起同業的競爭，由於各種生產事業的同時發展，又一定產生各種不同的經濟利益。無論蘇聯的生產或是英美的生產，都爲同樣的經濟規律所限制。管理的方式儘管不同，而支配生產的原理則完全一樣。由於工廠制度的興起，一定要發生僱傭關係，形成僱方和傭方；由於各種經濟活動的擴張，又一定會發生各種不同經濟利益集團的衝突。於是便想操持立法權，行政權，進而要運用組織，發動集會，推選代表。無論英美的議會政治，或是蘇聯的蘇維埃政治，方式儘管不同，而基本精神則是初無二致的。所以我們不工業化則已，我們如果工業化，則我們不能不有一套推行工業化的制度。不管這個制度由誰來推行，在初行之際，是難免受到操縱或把持的。但等到工業化開始進行，各種力量先後建立以後，則一個政黨的把持，或是一個力量的操縱，都是不很可能的。但如昧於這個道理，而根本懷疑，或是不肯合作，或是不盡督促的責任則我們都難望會有良好的憲政發生。

從第二點看，憲政政治，僅是我們人民全部生活情態中的一個部門，如果不在其它部門之內平行下工夫，則求良好憲政，將如緣木求魚。從民初到現在，四十來年，我們所以未能建立一個良好的制度者，就是因爲我們翻來覆去，光是注意到一個政治形式的改造，而未曾注意到整個社會內容的改造。受過教育的人，全集中都市，不肯下鄉，有頭腦的人，又多半在政治圈子內鑽來鑽去，不肯向社會的底層下工夫。下過工夫的人，又利用了組織，和現政權格不相容。所有的力量，竟全然用於無謂的長期消耗，我們致力於大學教育，而不看看鄉間的私塾制度，我們提倡現代化，有些人又偏偏向故書堆中尋故事，這都是遺憾。我們知道，現代化是一個整體的東西，有汽車就得有汽油，穿西裝同時就需要穿皮鞋，「全盤西化」，是數年前國內關心中國文化的人，提出的口

號，但我們審度事理，「全盤」二字，在今天仍有提出的必要。

此外推行憲政，我們還應該有心理上的準備。這要靠人民政府的共同守法。我們眞不懂，在高歌行憲的今天，政府還可不依法律而隨意捕人，而另外一些人，又專門在製造事件，以反對政府爲能事。筆者棲身的一個大學，一天有幾個女生，在街上大聲喧嘩，警察走來干涉，這幾個女生，未曾注意，於是被弄到警察局，每人押了兩個半鐘頭，這個消息第二天登在本市的報紙上，奇怪的是，這兩個女生事後竟若無其事，而此校男生，也未向警局提出抗議，結隊遊行。有一次這個大學開了一次大會，出席的人數很多，會後大家全站在飯廳外邊，等候循序入內，時正雨，那位白髮銀鬚的老校長，和學生們一樣在雨下站着，沒有一個人肯讓他先走一步，他也未作想先走一步的表示，這件小事，我看到後十分感動。一個國家之所以富强，除船堅砲利之外，還有許多的原因，而這許多原因又正都是我們所沒有的。

二月中旬於美國甘州。

論聘請外國教授

季羨林

中國學術落後，大學師資尤其感到缺乏；所以有時候我們不能不聘請外國教授。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我們當然不能反對；但是却有條件。

我先說一點我自己的經驗。十幾年前我在北平的一個國立大學裏念外國語文。這個大學的外國語文系是非常著名的，在全國是數一數二的，主要原因就是外國教授多，而且據說又都是有地位的學者。我爲這盛名所震驚，懷了一顆虔敬的心，走進了學校，走進了課堂。最初我當然不敢說什麼；但漸漸的我却懷疑起來。這些教授們多半是英美人，英文當然會說；但也就只是會說英文，說到他們有什麼專門研究，那就很成問題了。一位美國女教授是斯丹佛大學的碩士，教我們英文文字學。第一學期，她拿一位丹麥語言學家論普通語言學的書當教本。這並不是什麼深奥的著作；但她愈講我們愈糊塗。現在看起來並不是很難懂的格林定律當時却沒有一個人能明白。原因就是這位女教授除了英文以外，古典語言似乎一點都不會，恐怕連她自己也愈講愈墜入五里霧中了。第二學期換了課本，她要講她的據說最拿手的喬叟。第一堂上去，高聲背誦了喬叟的傑作 Canterbury Tales 的第一段。我們都大驚失色。幸而我們不久就發現了她的全部的本領就在背誦喬叟的傑作的第一段，我們的「色」纔不至繼續「失」下去，否則「失」出病來也未可知。我們看，她似乎連中古英文法也不甚了然；所以不久我們就讀起翻成近代英語的喬叟來。一年讀完，我們算是學了英文文字學。

另外一位教授，也是美國人，他教我們歐洲文學史，用的是他自己著的一部五六百頁厚的精裝的鉅著當教本。無論誰看到這部大書，也會不由的對這位教授起尊敬心；但倘若一加仔細研究，就會發現這部書除了厚大以外沒有別的任何長處，世界上除了中國以外沒有一個國家肯出錢替他印這部書的。裏面對世界上的許多名著的內容都有一撮要的說明；倘若仔細推敲起來，這些說明却不可靠，幾乎都有問題。這些名著的原文他當然沒讀到過，連譯本他似乎也沒讀了幾種，他只是直抄別人的書，而且抄得極荒疎，極不小心。這證明他連抄的耐性都沒有；然而他就是我們國立大學的名教授。

我在這裏不能替每一個我的外國老師都作一個介紹。總括一句，除了很少數的例外外，他們都差不多，不管他們是那一國人。在他們本國，他們都在大學畢過業。我不知道他們在本國究竟能夠找到什麼職業；但一定不會是大學教授，這是我們可以斷言的。他們有的或者可以在大學裏作助教，有的或者可以作中學教員，有的只配在商店裏作一個店員，在機關裏作小公務員。然而這些稱呼都不響亮，於是他們就來到中國，在我們的大學裏成了名教授。

倘若他們老老實實的作教授的話，作上幾年，說不定也可以作出點成績來。倘若認眞讀書，也一定會有所得的；但有些人來中國的目的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有的完全爲了好奇心，想來看一看這神秘的國度。結果學了一臉假笑，擠鼻子擠眼，打拱作揖，自命爲中國通，能說三句半中國話，回國去了。不久就寫成了幾厚冊論中國的書，於是出了名，發了財，皆大歡喜。有的在本國研究漢學，找到一個機會到中國來想繼續研究。在中國大學裏擔任的課程與他們自己研究的毫無關係。他們可以教歷史，教哲學，教希臘文，拉丁文，教古典文學；德國人教法文，美國人教德文，他們簡直是萬能。同時還忘不了自己的工作，找自己的學生或化錢雇助理幫自己翻譯中國的古書，詩詞歌賦全行。譯的時候儘可能找別人；但書籍出版的時候却只剩下自己的名字。於是也出了名，發了財，說不定讓本國的大學請回國去作漢學教授，仍然是皆大歡喜。

從這樣的教授那裏我們可以學到什麼東西，我們一想就可以知道。但這不過是在中國誤中國的青年學生而已，還不足以盡他們的任務。他們一回國，當然就會有人問他們在中國的職業，他們也當然就會回答說作教授。他們的親戚朋友一定很驚奇，像他這樣的人居然在中國能夠作到教授，中國的大學教育也就可以想見了。於是一傳十，十傳百，他們腦筋裏都有了先入之見，即使再想把中國大學的眞像告訴他們，也沒有用了。我說中國大學的眞像，意思是說，中國大學教授的本質固然不能同其他學術先進國家比，但也不像他們想的那樣壞。我們不否認，有很多中國教授同這些外國教授差不多；但也有些眞正有地位的學者，他們在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大學裏都能作到教授而無愧。把這些學者

同這些外國教授拉在一起，相提並論，簡直是不倫不類。要想避免這不倫不類的滑稽劇，我們只有讓夠作大學助教的外國人留在他們本國作大學助教，夠作中學教員的留在他們本國作中學教員，夠作店員小公務員的留在他們本國作店員小公務員。倘若我們非聘請外國教授不行的話，我們要聘請的是另外一些人。

這些人我們也聘請過，可惜數目很少，只能算作我上面說到的少數的例外。譬如北京大學以前聘請的美國地質學家葛利普就是其中的一個。葛先生是世界上有名的學者。在中國住了半生，弟子遍中國。中國地質學和古生物學能有這樣的成績，我們要歸功葛先生。這樣的外國教授我們纔需要，纔眞値得我們聘請。有葛先生這樣的外國教授，是我們中國大學的光榮。即便有許多學者不能像葛先生一樣在中國住那樣許多年；但這也沒有關係。杜威羅素在中國只是旅行了一趟；但他們在幾個講演裏留給中國的影響仍然很大，是那些擠鼻子擠眼打拱作揖的中國通和那些讓別人作工作自己來出名的所謂漢學家萬萬想不到的。

除了這些眞正有地位的學者以外，爲了中國學生學習外國語言起見，我們也可以聘請外國人來要。但我們絕不應該像現在這樣隨便一個外國的張三李四都給他教授的名銜。我們並不是沒有前例可援。我們可以學英國德國的辦法，只要教實用語言的外國人一律給他教員的名義。只有眞正有地位的學者，最少在外國也能作到正教授的，我們纔給他教授的名義。這就是我在開頭說到的條件。

三十七年一月三十日北大

和蘇聯相處之道

Getting On With Russia. The Nation, Dec. 23, 1947.

拉斯基

這是英國拉斯基教授最近發表的三篇國際政治論文的第三篇。第一篇見本刊三卷十七期，第二篇見本刊三卷二十期。譯者

一

現時，沒有一個國家比了蘇俄更多地被人議論着，并且，沒有一個國家比了它更被人惡意地在恐懼和厭惡中仇視着。它領袖們的錯誤常被人引作對它下判斷的根據；這些錯誤確是很重大，有時甚至難予辯護。在另一方面，它的朋友們却以熱烈的崇拜來判斷它，他們用和但丁或密爾頓一般的史詩來歌頌它，而不把它視爲一個自然的歷史產物：深遠奇特的原因造成了深遠奇特的結果。我們現在看蘇俄，有似一世紀半以前畢特 Pitt 和特威脫 Timothy Dwight 看革命中的法國，都有一個血紅色的天幕反襯着。我們憤怒地談論着「鐵幕」，其實所謂「鐵幕」，一半是指我們不願意費力去學俄國的語言，一半是指我們看見這個國家正供奉着非我所信的神祇而感到不安。若是我們眞能努力從俄國人的立場和根據俄國人的經驗，尤其是這一世代的經驗，來面對人類文化問題，筆者認爲我們至少能夠找到門徑來避免使兩個不安和仇視的世界愈趨分裂。我們的能否找到這門徑，正是此後五十年間人類的禍福所繫。

俄國不具備英美所是認的民主政制。其實，若是俄國果眞具備了這些政制，這纔是一件怪事。它的歷史和英美迥乎不同；它是下列諸種事物的一個神祕混合物：拜然丁 B,zantine 式的皇國，極端壓迫和腐敗，不負責任的貴族階級，文盲的農民，少數而把持的布爾喬，和叛逆的知識分子，後者信奉了馬克斯主義而把它改造成爲俄國式樣，用以適應俄國的目的；它在第一次大戰慘敗中，由知識分子硬掀起了無產階級革命，而爲大衆人民在一知半解中所接受。在經過這樣一個革命後的一個世代內，若是西方的民主政制竟能在這裏長成，將是一件難於置信的奇蹟。

誠然，在俄國有很多事犯了嚴重的錯誤。但是，當一個巨大民族，正從十八世紀一步跨入了二十世紀，對於阻礙它前進的事物正不惜犧牲，我們誰曾聽到過這樣一個民族會同時希求反對者的贊許呢？十七世紀英國布爾喬革命中，和美國獨立戰爭中，我們也沒有聽到過對於保皇黨等反動者的優容。俄國革命的理論，得在具有濫用權力傳統的他國，獲得同情，也無足怪，因爲這套理論原就不僅適用於產生地。所以我們對於俄國這套理想，不能藉直接和間接的「援助」，軍事占領，甚至壓制，而得消弭。我們祇有靠另外一套理想來超越它，使一般久處於貧困與不公平鎖鍊中而復有勇氣來掙脫這鎖鍊的人民，甘願接受。

我們更應牢記：若是俄國對外活動含有陰謀，詭譎和殘忍，那麽，我們自己從一九一七到一九四一年的對俄活動中也正多着此種成份。俄國革命的能夠迄今存在，絕非因我們的幫助。那裏曾有不斷的冒險者，想藉內戰來推翻革命的成果，而這輩人的終歸覆滅，並不能歸功於倫敦和華盛頓的當局。在希特勒的陰影已開始籠罩了歐洲，日本已開始擴展其帝國於東方以前，歐洲任何國家和華盛頓任何政府從未給予莫斯科以一點援手。在納粹主義的眞意已大白於世以前，——除了張伯倫還夢想慕尼黑的勝利和貝當還認維希是一七八九的報復外，——曾有千萬重要人物對於希特勒，莫索里尼和佛朗哥表示崇敬或寬恕，甚至邱吉爾也曾讚譽過莫索里尼，并且爲了西班牙共和國的傾覆而歡呼，這個傾覆終於葬送了整個民族到反革命的囚牢中。

當希特勒開始征服世界，珍珠港的慘敗復預告了一個新的黑暗時代的到臨，英國政府確曾給予俄國以巨量的援助，並履行了諾言：以戰爭所需的技術共同使用——除了原子彈祕密外。同時，差不多有三年的時間，俄國國土被蹂躪，億萬的俄國人民犧牲了生命，纔使英美贏得時間來開闢歐洲的第二戰線和反攻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勝利。俄國固然在千鈞一髮的時機叨蒙了我們的無量援助，但是沒有人能夠否認：我們也曾叨蒙了俄國領袖們和人民的巨大幫助。

二

戰爭中的結合是比較簡單，因爲聯盟國的唯一目的是在給予侵略者以決定性的擊敗。和平中的結合則比較困難多多，尤其是在一個革命的時代，當時沒有一國不在開始評價其社會制度的基礎。要懂得爲什麼俄國對於和平的看法會大異於華盛頓的看法，筆者認爲並不太難，雖是要解釋俄國和倫敦間對此的岐異，確是較難。俄國看見了腳下的懸崖。他的統治者明瞭：在此後十五年，甚至二十年中，他們必須要求其人民重新步上艱困的道路，纔能返回戰爭開始時的地步。他們更看到——他們怎麼會不看到？——強大的美國，雖有時慷慨而唱着高調，而他內在的和不能自已的動向却是在實現所謂「美國世紀」。他們更聽到：美國政策被稱爲「保衛民主」，而俄國政策則被稱爲「戰略性的帝國主義」，雖這兩個政策並無所異。中東的油區，因爲和俄國地域接近，所以被認爲必須對之而予以保衛，但當俄國人指出：西方國家的佔領中東足使英美前線直逼高加索的邊線，因而威脅俄國的生命線，則被認爲可笑。

俄國人眼看美國政府傾輸資財以援助希臘和土耳其的反動政權；他們更聽到貝文欣慰的呼聲，當美國的坦克和飛機開到了雅典和伊斯坦波。他們知道——他們怎樣會不知道？——波蘭、匈牙利、南斯拉夫和中國的古老而罪惡的特權階級好像對於英國的外交部和美國的國務院具有不可抗的吸引力。他們更駭然於美國貸款的流向意大利，正當加斯波里已將社會黨和共產黨份子逐出意政府之後。他們不得不注意到英美一方面對於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獨裁政權的寬容，而另一方面對於俄國勢力下的政權的極端嚴厲，在後者，其主要原則是不許戰前執政的法西斯份子重新取得政權。簡括言之，俄國人應否在大體上獲得如下的結論：美國利益乃集中在保衛資本主義的民主政制，苟民主政制而不可得，乃在保衛任何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政制？俄國人從千萬美國人的演說和時論中，是否應該認定：甚至英國的初生而溫和的社會主義民主，也被美國疑懼爲對於「美國生活方式」的一個威脅？

或者有人會指出：「但是俄國領袖們的外交政策正有着重大的缺陷。」誠然，他們的缺陷，無論在鉅細事件上都極重大。他們在拒絕里林泰爾氏 Lilienthal 管制原子能計劃時從未提出適當的理由。他們早應參加由奧爾爵氏 Sir John Boyd Orr 所主席的食糧與農業組織。他們更應該盡力促使聯合國文教組織 UNESCO 有所成功。他們也應該支持國際貨幣基金。他們對於伊朗所未遂的冒險是無法予以辯護的。他們阻止了十五個俄國婦女跟隨她們的英國丈夫，這是件極端愚蠢的事。他們口頭和書面宣傳的一大部份是粗暴的，甚至有些是有意的不忠實和不智，想以抹殺事實來獲得效果。他們剝奪了解放中東北的物資，實在是下流的做法。他們在德奧聯盟管制機構中的做法，有時是乖異，有時是放縱，有時是野蠻。在安全理事會，聯合國大會，和外長會議中，俄國的代表們玩着詭辯者的把戲，以拖延和阻撓來迫令忠實人憤怒，并且拘泥着舊金山憲章的字句而背棄其精神。他們對於衛星國內的共產黨，本來有些是無足輕重的，都盡量扶植掩護，而形成了寓言中由蛤蟆變成巨熊的地位。

三

上舉種種都是事實，并且都能引證得更形動人。但是，筆者迄未獲得證據，足以證明俄國意欲發動戰爭，或是在此後十五年到二十年中有發動戰爭的物質能力。更進一步，筆者更未獲得證據，足以證明俄國意欲帝國主義的擴展。相反地，筆者相信俄國領袖們正懼怕着戰爭；他們恐懼着資本主義國家知其弱點而予以包圍；他們疑懼聯盟國在德，在中東，在希土，在中國日本的政策，乃在獲取基地，以發動旨在消滅蘇俄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據筆者的看法，他們的疑懼更以如下的認定而加強：他們認定，爲了獲得本國的最大安全，對於這個不僅經過這次世界大戰，尤其經過二十五年來革命改革中所受盡犧牲的疲乏民族，必須激發其熱烈的國族主義。於是，爲了激發其人民的熱烈國族主義，俄國領袖們不得不對於其可能的敵人描述得格外醜惡，把他的居心和政策描述得分外陰險。此外，俄國的傳統外交本是斤斤計較，從不輕易攤牌，尤其相信說來簡單的事物必然是複雜。我們認清了這些，纔會對於俄國的國際關係獲得適當的透視。

我們更不應忽略了一個世代以來處於賤民民族地位所產生的「自卑感」，再和由斯大林堡 Stalingrad 壯烈史詩所象徵的國族榮譽感，相互結合而形成的錯叢心理「鬱結」Complex。最後，我們必須牢記：新生的俄國尚缺少老練的人才，對於外國能精密觀察和分析。迄今爲止，他尚未找到較年輕的人，能和里特維諾夫和梅斯基的洞見和智能相倫比。

四

苟能容忍和理解，筆者殊不信和俄國的調適將爲不可能。在確切認清了現有處境後，我們會了解容忍和理解是必需的。或有人會指出：當茲共產黨國際情報局組成，法國共產黨正在煽動總罷工，更謾罵社會黨人爲反動的戰爭販子，凡是種種，已使容忍更爲困難，理解近乎不可能。筆者認爲此種見解不免失之近視。筆者個人也承認共產黨國際情報局的組成是一個失着，一部份因爲它使敵人多獲一反宣傳的藉口，另一部份因爲它不祇不能增加莫斯科對於其附庸國的勢力，反而將使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間的鏬隙更形加寬。但在本質上它是屬於一種心理姿態者爲多，而屬於實在的組織者爲少。它的主旨是在使俄國在東歐的勢力得到更密切的結合，而不是在使俄國理想能在西方增加力量。它所暗示的正是莫斯科自認輭弱，而不是自信剛強。果有此自信，則杜魯門主義正好促使東歐國家愈向着莫斯科，而不再需要特設這個機構。事實上所以需要這樣一個機構來公告毗連俄境諸國共產黨間的加強結合，適足以表示克來姆林宮中人物深怕美國經濟援助眞會削弱他們的權力。

法國的局勢則有些不同，筆者不認爲那裏共產黨的政策是在造成混亂，激起革命，從而取得政權，用以摧毀馬爾歇計劃在西歐的主要意義。法國罷工是下列諸成因的自然產物：低微工資，通貨膨脹，大規模黑市，極度不良的食糧分配制度，後者使城市成爲農村的犧牲者，而對於農村則自一七八九年以來沒有一個法國政府敢於有所對付。大部份的罷工並非爲共產黨所引起，旣起之後，共產黨便從而想法來領導，因爲他們自認應爲任何勞工運動的領導者。當他們的領導已獲得廣汎——雖非深遠——的響應時，他們就過於高估了自已的力量，因而想藉勞工的力量來推翻許曼政府。他們却見識不到這一舉措——果眞成功——反足使戴高樂登台，苟不成功，更足自損威望，因爲美援對於法國將顯然成爲更所急需。事實上，共產黨這次錯誤正和一九三三年的相同，那時他們曾幫着希特勒取得政權，因爲相信他們會很快地成爲這政權的繼承者。

至於法國共產黨的行動究竟多少是得到莫斯科的贊同，多少是出於自己的激發，固非筆者所知。但筆者頗欲相信法共曾依例向莫斯科過分渲染了該項計劃的前途，但當杜萊 Thorez 從莫斯科回來時，却把這個必將全盤失敗的計劃取銷了。筆者認爲俄國領袖們現在已經了解：除了意大利的可能例外之外，他們將不再能控制西歐的勞工運動。這點了解必然更使他們對於美國勢力感到恐懼。據筆者的看法，歐洲的左派力量應該在現在這個時機向俄國人提供勸說並使之相信：左派力量的拒絕接受共產黨的領導，

一起來抵禦直接和間接的侵略者，若是莫斯科自身是具有理性，更使它國共產黨也了解對於共同目標的忠忱和合作的必需。

五

荷無忍容和理解，現在的局面已經排定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大戰的終結將是暴政遍地。若是有些批評者會說：他們不甘和共產黨的俄國適調，而寧願和後者打個明白，則筆者的答復是：這些批評者正是人類的敵人。若是他們抗議稱：適調等於求和，而我們向希特勒的求和曾一無所獲，則筆者可給予如下的斷然答復：如已證明，希特勒的最後目的是納粹國家的獨霸全球，在這個目的下，最初犧牲者是無辜的德國人民，尤其是猶太血統的德國人民。希特勒蓄意驅使一個文明的民族淪於愚昧無智，以獲取他們

根據證據，筆者相信對於蘇俄不能加以同樣的罪責。蘇俄誠是一個獨裁國家，也是一個嚴酷的政權。他有着重大的錯誤，有些錯誤甚至難和罪行相區別。但是，無論他暫時的缺陷有多少，他對於科學的眞誠，對於教育的熱忱，對於人民所已開發的巨量機會，對於其屬國人民地位的提高，對於婦女所給予的新身份，對於反猶太運動的禁止，對於有色人種的一視同仁——凡是種種，筆者認爲足以證明：在他的獨裁政制的底層確實具有在俄國建立民主生活方式的目的。最大的障礙是他領袖們所感覺到在國際關係中的極端不安全。若是我們能夠說服他們，使他們能夠獲得安全的信心，則筆者相信現正阻礙着相互理解的陰翳，不難消失。筆者所能想像的最好方法，得用來說服俄國領袖們，使他們獲得安全的信心，乃是將杜魯門總統對於幫助希臘和土耳其，美國政府正支助着一個快將淪落的社會類型；但是對於俄國的幫助，將大大減輕一個社會新秩序誕生時的痛苦，這個新秩序一旦開始長成，他對於我們整個文明，將有無窮的供獻。

最後，還有二點需得提出。憎恨俄國革命的美國人應該記取：當法國從封建和教會中獲得革命解放時，現代美國人的祖先們也曾因錯誤的判斷而對之深惡痛絕。美國人更應記取：當美國南北戰爭中，甚至一直到南北戰爭結束之後，祇有歐洲的勞工階級纔對於美國的民主具有信心，也祇有他們纔了解當時美國人的夢想。在此後的一個世紀中，可能沒有另外一個勢力，得和美國相倫比。在這樣一個時代中，美國人的責任是在使吉佛遜，林肯和羅斯福的主張成爲世界的原則。較狹小的胸懷，將不足以盡他們應有的使命。

（本刊特約譯者譯）

在荷澤解放區所見（下）

江沙

鬥爭、翻身、倒苦水

共產黨鬥爭的可怕情形，我們在國民黨的報紙上也常可見到牠的殘酷。冀魯豫行署所辦的「冀魯豫日報」的大部篇幅，都是關於鬥爭的具體報導，據行署的人告訴我們，該報是以報導鬥爭爲主，用爲檢討參考的。他們還有連環圖畫的小册子，也是宣傳鬥爭的。其他宣傳書籍，當然不計其數。

我們在那裏曾看到了鬥爭荷澤天主堂的德國神父和全部修道女。鬥爭的場面很偉大，地點在城內公共體育場，事先並由市政府發請柬，請大家去參觀。鬥爭時裝有擴音機，被鬥的神父修道女們都並排坐在台前，老百姓都如看戲似的面向台上，或席地而坐或就站着。鬥爭開始，先由吃過被鬥者虧的或能列舉他們的劣跡的，一個一個到台上去報告經過，然後由被鬥者上台辯護或承認或否認。當時我聽見這些破衣無告的男男女女，上台去侃侃而談，確也覺得驚奇。又看到曾經「有我無他」的德國神父被人列舉出他的通敵害人以及偷城隍廟的琉璃瓦來造自己的房子等行爲後的窘狀，確也可以使被欺侮者吐一口氣。我當時見一老百姓火氣很大，要上前去打一修道女，就有另一個人上去拉住這個老百姓說：『這是講理會，你說出她的不好，交政府去辦，你用不着去打啊！』這個老百姓也就不打了。天主堂的一批德國人被鬥爭了好多天，每天都有美國人在那裏拍照參觀，也並沒有殘酷的行爲。數日後，我問荷澤市長關於處置這批德國人的事：他說：『鎗斃是不至於的，我們想將材料整理好後，送交國民政府驅逐出國。』他又說：『鬥爭時要控制老百姓的感情也眞太不容易。如我們控制不得法，德國鬼子眞要吃大虧，因爲這個老神父害死的人，是有目共睹的。』

在我們離開荷澤以前，那裏曾展開了大規模的鬥爭會，一天都有好幾處，我們也就天天去看熱鬧。據當局告訴我們，現在我們要限期鬥爭完畢，過此限期，不許再鬥。所以那時這些被鬥者在接到通知後，個個神魂不安。有一次，就在我們辦公附近場地上，看見一批放高利貸的人被鬥爭，當時有一個老百姓說他曾經破壞過「黨」，於是一批赤脚的兒童團上去把此放高利貸者劈劈拍拍的打一頓，打過之後，被鬥者對主持鬥爭者說：『你我都是熟人，爲何不勸一勸？』主持者說：『兒童團要打你，我那裏能勸！』看情形，是事先安排好請他吃吃苦的。還有一次，我們在晚飯後出去散步，見有一場上在開鬥爭會，當時「講理」已畢，正由此主持者在致「閉幕詞」，他好像說：『我們窮苦老百姓一向低頭受人欺侮，有苦向肚裏吞，從來不敢在土劣面前辯論說話。現在共產黨來了，給了我們與人平等的權利，可以和這些欺侮過我們的人公開的講講理，一方面把我們的苦水倒一倒，一方面要這些人知道我們也是人。』

當大規模鬥爭時，天天有被戴綠紙高帽子上書「大孬蛋」三字牽着手在街上敲鑼遊行的事。我問他們：『如果有人的罪要監禁的話，那末你們的監獄在那裏？』他們說：『我們沒有監獄，我們就禁他在家裏，有兒童團們看守，他是無法自由的。』他們這種黨的組織作用，眞是發揮了極大的力量。

我們在荷澤城內，尚無殺人殘酷之情事發現，但鬥爭殺人之事，冀魯豫日報上是有記載的。據鄆城縣長劉傳朋談：『凡兇惡的土劣害人太惡的，有時會被當時殺死。』他說：『某處曾有一土劣，惡毒不堪，曾弄死別人的丈夫，強姦他人的女兒，佔有人家的土地，這是大家知道的，但在以前，官僚與土劣是相勾結的，誰敢在他面前放個屁，但被欺者的懷恨是不會消滅的。在鬥爭會時，這個受欺的老媽媽一句話也不講，上去就是一刀；刺過之後，自己

就說：我願意抵命，我的氣出了。」

我對於共產黨的講理、翻身、倒苦水等等，都尙無惡感，但對於鬥爭的方法和有些殺人案件，却認爲很不妥當。但回頭一想，也覺得不能免。照我們中國的社會組織，擺着士大夫架子的紳士，是農村的無冕統治者，而種田的農民呢，永遠站在下風。譬如現在有些參議會等等，那能代表眞正的民意，那能保障眞正老百姓的利益？更談不上有機會給他們上台講一句苦話。而共產黨的確抓住了這一點，使多數的窮苦農民也登到台上去，說一句人應該說的話。他們天眞，他們誠懇，他們嘗到了一些人的味道，不免感情奔放，手足無措，不無越軌行動發生。我們須知物極必反，所以我是同情他們的。我有一位小地主朋友，是鄆城人，我以爲他已不在家，但當我赴鄆城專員公署打聽，知道他却在鄆城縣政府當民政科長。他見了我，自然覺得奇怪。他告訴我：『開會時，鄉下老婆子也會上台講話，可見老百姓的力量如已引發出來，是了不起的。』我深深的可惜，我在荷澤時，沒有把共產黨領導民衆發動民衆組織民衆的方法學到手；但我細細一想，只要當老百姓是人，他就會有人的力量發揮出來。

現在我們都說共產黨最霸道，不民主；而共產黨却說國民黨獨裁，法西斯，太不民主。我認爲國民黨的民主是形式的民主，共產黨的民主是黨控制下的民主。不過大體說來，在解放區內因爲沒有土劣官僚等特殊人物，所以比較的民主。如他們這種開會的方法，又如前面王笑一所談與老百姓商量公家事情的態度，都的確相當民主。我們在荷澤時，他們已準備好出席南京召開國民大會的代表，據他們說，是用最民主的方法選舉出來的。

我說國民黨的民主是形式的民主，這大家可無須否認的，如選舉等等，都是有其名無其實，可作證明。共產黨的「民主」，實際上近乎一種「平等」。我們在荷澤因爲沒有什麼大事可做，所以天天去看「蹦蹦戲」，去得遲了，只好夾在人縫內擺杌子，决無法預先定座。就是行署的主任去看戲，沒有位子時也只好站在後面。總之一句話，特殊利益的不平現象，不大容易許可存在的。關於這一些，與鬥爭等事有着聯繫的關係。

愛「他們」的和討厭「他們」的

我們與共產黨政府方面的人接觸，當然只看見好處，看不見壞處。所謂好與壞，我們可以拿老百姓的反應爲標準，就是他們的一種設施，老百姓對他們好的，就算好；反之，老百姓表示討厭的，就算壞。在解放區內，有的老百姓的確對他們有好感的，可以鄆城的老百姓對縣長劉傳朋爲證。依我所知，大多數農人們的確擁護他們，以前赤貧的人，現在能分到一些地，還有他們那一套的精神食糧，在生活上不致餓死，在精神上也有所寄託，所以是愛他們的，肯爲他們拚命的。至於討厭他們的當然也有，荷澤城內的商人大多討厭他們。

商人的討厭他們，原因也很簡單。商人以能做各種各樣的生意能賺錢爲目的，但在共產黨控制之下，「進口」和「出口」都有限制，奢侈品和上海香烟都不准進口，而且把有錢的紳士們趕走後，社會的需要幾乎談不上享樂品，所以賺錢不能多。社會的繁榮和商人的賺錢，大部靠闊人的奢侈，今共產黨限制奢侈，限制享受，商人之恨他們，自然是必然的。

話雖如此，但荷澤城內的館子生意仍很好，第一，商人雖然錢賺得少了，但總比農人闊氣，吃在肚裏，是頂實惠。第二，比較有錢的人，有的錢也做不成爹做不成娘，也只好吃在肚裏。第三，行總的一大批人在那裏，錢多沒處花，只好在吃上加些功夫。

商人們討厭他們，但手段高強，仍能設法賺錢。據我所知，他們以黑市用「抗鈔」掉換我們的法幣。抗鈔的「官價」，我們去時是法幣十元掉抗鈔一元，後來跌到法幣六元掉抗鈔一元。行總的這些人，却常以法幣三四元去掉抗鈔一元，商人收買法幣，卽可以來商邱開封等地收買東西。我知道有許多行總開車的司機，在商邱買黃金，到荷澤換抗鈔，再以抗鈔換成銀圓，回商邱賣脫，變成法幣，再買金子回去。不過這種生意，只有行總的司機可做，因他們天天運麵粉來回於商邱荷澤的道上，一來一往，爾利很大。這種事情，共產黨當局並非不知道，只是對行總的人特別客氣些，所以眼開眼閉；但如捉到了買進黃金出賣現洋或私自收購法幣的商人，那就非頭戴「大孬蛋」綠帽子遊街不可了。

我們在荷澤時，本來聽不到商人們對他們有討厭的話，由此也可見他們黨內組織的嚴密。有一次，我在商邱與一汽車隊長談天，始知該隊長是販賣黃金現洋的，他說：『荷澤城內的商人天天希望中央軍去，對「老八」討厭極了！』我仔細一問，原來討厭他們的原因在此。

防空和疏散

九月間，南京的和談越來越沒有希望，前方的戰事也就越打越緊，蘭封被共軍佔領，商邱也動搖，荷澤城內展開了募款勞軍運動，王化雲天天來向我們報捷。我們的運麵粉汽車也停了，有一天，傳說商邱也被共軍佔領。

隴海路旣斷，我們與南京的消息完全隔絕，他們的交際處通知我們要防空，希望我們疏散到鄉下去。在開防空會時，他們宣佈道：『在軍事方面，我們絕對有把握，惟國民黨飛機來空襲，你們的傷害，我們不能負責。』商量好久，由聯總的外國人出面，假行署的無線電台通知開封國民黨軍事當局，在赴解放區轟炸時，不炸聯總行總機關。聯總行總機關的記號是一個斜十字。次日，我們就用美國大油布上縫上白布斜十字，蓋在屋頂上。王化雲通知我們，無線電已經打出。共產黨的電台與我們軍事當局的電台，還會通報，你說奇怪麼？

他們機關的疏散很快，神不知鬼不覺，都搬到鄉下去了，只有交際處留在城內，以備招待我們。他們防空，也不像國民政府所屬的機關，要請人造防空洞，而是由男女職員，向老百姓借得工具，自控電光式防空壕。這種精神，在我看來，已是了不起，而他們却不以爲苦。

戰事越來越緊，我們與南京方面的消息完全隔絕，幾經商量，毫無辦法，結果我主張到商邱去看一看，於是與聯總辦事處的美國人商定，在某日一大早，由外國人自駕大吉普車赴商邱，我與一翻譯官同車隨行。那次來商邱，車陷在淤黃河（徐州以北的淤黃河，不是山東的淤黃河）內，幾乎出不來，結果出了很多錢，請我們這一方面的老百姓用牛拉起來的。

到商邱後，火車站上（地名朱集）買不到東西吃，城內物價飛漲。我問城內的老百姓怕不怕共產黨，他們說：『共產黨不來，我們也很苦，今天派款，明天挑土。』我一看，商邱正修築城防工事，城牆上佈滿了迫擊炮。這裏我說一說前方的防禦，共產黨是運動戰遊擊戰，我們是躱在城內，向老百姓要吃要喝要玩，不敢出城一步。駐在商邱的某團長，還發動士兵，到火車站去運救濟麵粉，賣給別人，大發洋財。

我們在商邱只過一夜，次日卽回荷澤，向同事報告商邱情形。不料給共產黨當局知道了，怪我們事前沒有通知他們，私到商邱，以後萬萬不可；否則，如出了事，他們不負保護之責。

撤退的一幕

隴海路旣斷，倉庫和工作隊已無麵粉可運可發，我們更沒有事情可做，而且開封商邱之間已經不許我們的汽車自由通行。幾經開會商討，後來决定一同撤退。

撤退以前，他們希望我們留一二人 （下接十七頁）

和諧與戰局

觀察記者

（觀察專稿）

在戰局極度危急，經濟極端惡化，蔣主席獨居牯嶺靜思深慮全盤大局的時候，京滬間忽然傳出了和談的消息。這是從美國合衆社傳出的：一個是蘇聯將調解內戰的消息；一個是司徒大使希望國共重開談判的談話。對這些消息，官方極力加以駁斥否認。俗語說得好，『無風不起浪』。浪從何起，風從何來，這倒成了全中國，甚至全世界的一個啞謎。

『打不下去了』，這是近來關心時局的人彼此見面不言而喻的一種心聲。就是在政府中主持大計的人，口頭雖硬，心中却虛。他們只好說：『這時除了打，還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再不聽見『三個月』『六個月』消滅共產黨的豪語了。孫副主席在台灣演說要打長期戰爭，但怎樣打？用什麼打？而長期長到什麼一個時期？孫副主席沒有說，恐怕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總之『打不下去了』已經是不能不承認的一個鐵一般的事實了！

在政府方面所仗恃的就是美援。但美國的援助，也非如政府所想望的可以予求予取。好容易呼喚出來了五億七千萬元的貸款，但還要經過國會的通過。而且馬歇爾說得明明白白，這是一個物資的救濟計劃，給中國政府一個喘息的機會，並不能用來改革幣制及援助軍事以解救目前的危急。中國政府對此早發出了不滿意的呼聲。要支持戰爭，還要自己想辦法。美國的對華政策雖然似乎從觀望轉趨於積極，但這積極依然慢得很。在中國政府方面，大有緩不濟急之勢。美國對華爲什麼天天說幫助，又不肯大伸手？這裏美國有美國的苦衷。美國不能讓中國共產化，不能坐視中國的共產黨取得政權，因此對中國的政府，非幫不可。馬歇爾也明白，即令有了外援，中國政府不一定能夠打敗共產黨，更談不到消滅中國的共產黨。並且持久內戰，愈打愈窮，愈窮則對共產黨愈有利。在當時，美國政府認爲中國倘能和平，或者不失爲遠東防共辦法之一。馬歇爾前年來華調停，用意在此。一九四六年政協失敗，一九四七年和談破裂，大規模內戰再起，在政府方面有『三個月』『六個月』擊潰『共匪』的豪語，在馬歇爾則以爲倘在軍事上政府能稍挫共產黨的銳氣，國軍稍佔上風，和談或更有希望。司徒大使沒有隨馬歇爾以俱去，美國還在等待一個重開和談的機會。

一年來盡在打，當然對於『和』，無從談起。自政府發表戡亂命令後，談和便是反動。當時政府氣燄，彷彿只有共產黨無條件投降，那還有什麼和談。國人不敢談和；客卿不便言和。到了今天，一方雖已精疲力盡，招架不來，而『共匪』却愈戰愈強，這固非政府始料所及，更非美國始料所及。美國這時的對華政策，自然陷入苦境了。不幫，勢有所不能，幫亦恐已無濟於事。幫與不幫，在美國國內正吵得一塲糊塗。於是由馬歇爾在國會提出五億七千萬元的援華案，而由司徒大使在中國發表致中國人民書。一方面應付了國內的共和黨和國外的國民黨，一方面又說明這不是幫助內戰，而是救濟中國貧民，中國仍須自助。左右爲難，進退維谷，這就是當前美國的對華政策。司徒發表致中國人民書的第二天合衆社記者前往一追問，司徒大使索性老實說明意在重開國共談判。據說合衆社的稿子曾經他核定同意發表。當這談話傳出後，政府方面的主戰派大爲震怒。廬山並有電話到京，認爲正當前方作戰火熱的時候，後方怎可以言和，要求更正。於是當中央社記者前往的時候，不得已予以否認。但這位當大使的老教育家究竟不能出爾反爾，於是給合衆社記者的信上，說明記者引用的正確，不過外間解釋錯了。

這裏還要一述合衆社上海電傳蘇聯調停中國內戰的內幕，這也是有來源的。據內幕消息說，兩個月前，張治中將軍在京時常與邵老及張行政院長談時局，大家見面都是一句『打不下去了』！後來大家又推動張治中去試探最高當局的意思。有一次張治中在京宴請蘇聯代辦費大使及武官羅申，有張羣，王世杰，邵力子等重要人物作陪。既然是有目的的請客，自然會說到和談問題上來。後來不知怎樣談到蘇聯來做調人的話。據說羅申武官願意打電報同莫斯科去問。後來他自已回國了。這回國與和談有無關係，亦無從知道。最近蘇聯又任命羅申爲駐華大使，於是使人又想到張治中宴會的往事，於是又傳出了蘇聯調停內戰的消息。不止如此，同時還傳出來和談的三個條件。合衆社上海電與南京電先後發出，不知是否有意配合司徒的談話，或是無意的巧合，這倒耐人尋味。有人這般猜想，蘇聯既應允調停，這或者是中共可以言和的證明，既然如此，美國却不能讓蘇聯單獨做了這個調人。美國應爭取時機，把蘇聯調解的消息發表，這或者是合衆社消息突於此時發出的原因。今日美國對華政策正是走頭無路的關頭，到沒有辦法的時候，希望拉着蘇聯來共同進行和談，亦未始不是無辦法中的辦法。從和諧的內幕裏，也不難窺知一二。邵力子在向記者談話時，也認爲如美蘇共同作調人，這和談的前途是可能的。不過目前是兩大陣營的作戰，美蘇不能單獨在中國合作，誰亦知道。因此和談只能成爲曇花一現的和諧而已。然而這却不是無風而起的一個波浪。

和諧的起因，外來的因素還是受着戰局的影響，尤其東北戰局是一個大關鍵。

東北元老張作相、萬福麟、馬占山等適於此時晉京。在下關車站歡迎的一幕，其情況是極爲盛大的，繼之中央大員的歡宴日夜無虛席。這是什麼作用呢，有人竟比作病入膏肓，醫生束手，只好求神拜佛——。元老們心中自然也明白東北的局勢已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他們也作不了什麼。只要一看原邀請人陳誠總長和他們見了一面之後，沒有說什麼就遄自去滬養病了，就知道東北已經到了無能爲力的地步了。剩下白部長，在親赴車站歡迎的時候，就不勝今昔之感。感慨什麼呢？這要追溯到抗日戰爭初勝利時，他們東北問題就曾建議過三個原則：（一）起用東北人，（二）組訓民衆，（三）防止共黨。那時未被採納，而今事隔兩年，中間經過熊式輝的接收階段，陳誠的親自督戰時期，以及現在衞立煌硬着頭皮去作替身的階段，到走頭無路時，纔又想起了東北人。況且這次請求他們來京的原建議人是劉哲副院長，他以在京東北元老的身份，想起了東北人。他向陳總長說的時候，就認爲中央何在乎幾張飛機票，也許能產出一個辦法來。原來的動機，就含着姑且將死馬當活馬醫的意味，其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東北元老們挽救家鄉之道，惟有請求中央即行增援重兵。所謂軍政配合，是必須大軍前去，打出個地盤來，才能組訓民衆。新自滬返京的鄒作華說：『把球門的已經疏忽，隊員也疲倦了，必須有個傻小子把球踢出去，才能振作精神。這傻小子就是中央的生力軍』。空手前往，元老又不是天兵天將，不會有奇蹟出現。但試想，中央假若還有大軍可增的話，那麼陳總長何致於扶病而囘，衞將軍也可以指揮若定，又何必要請出元老們來求神拜佛呢？但儘管無兵可援，口裏仍不

「北望滿洲」

觀察記者

（觀察專稿）

幼小的時候，常常聽到直軍的老總們高吭唱着迷信武力統一者吳佩孚的「蓬萊閣」。做學生的和小孩子們也莫明其妙的跟着哼『北望滿洲，渤海中風潮大作，想當年……到而今……何日奉命提銳旅，一戰恢復舊山河』。南北混戰中，吳佩孚打下衡陽，乘勝主和，班師北上，獲得了兩湖及直魯豫的軍權，直皖戰又把段系打倒，他心目中以爲一切不足畏，處心積慮的要打奉天，『北望滿洲』的歌聲中流露着他的野心。他把自已比做關岳，把張作霖看成賣國喪權的準漢奸，他那裏曉得是張作霖有張作霖的做法，張作霖在外交常軌之外維持了中國主權，最後還用「三角聯盟」把他打下去。張作霖被日本謀殺後，在「九一八」事變的不抵抗政策下，斷送了東北，有僞滿洲國的出現。中國的抗戰是爲了收復東北，還是天該地該的事，日寇降伏，僞滿瓦解，於是又有人開始「北望滿洲」了。東北豐富的資源，經過敵僞「養鷄生蛋」的十四年建設，金光閃爍，更使得一些人看着眼紅。

開始就錯了　今天才發現

國軍接收東北，因爲環境的特殊，在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都擬定了一些特別辦法，如保安長官部之設立，新省區之劃分，東北流通券之行使，總總方面似乎都顧及到了東北的特殊情形。開始準備『外交接收』有中蘇之折衝，而後準備「政治接收」，有軍事調處之東北商談。最後還是「軍事接收」，黑山白水間兵戎相見。政府雖認識東北的特殊環境，顧及到了外交等問題，但根本忽略了兩件事，（一）張學良父子及奉系人物與東北之歷史關係；（二）共軍在東北十四年中的地下活動。

政府可以說是爲了國家的統一，在各地不許有特殊勢力存在，對東北更有這種感覺，不能再教張氏父子及奉系的勢力在東北復活，以爲統一的障礙。於是三省劃分九省，抗戰時期的流亡省府解體，那時用他們做號召，現在用不到了，勝利的是東北一批新貴，失敗的是那些用做號召的元老。還有張學良是不能被東北人忘記了的人，他只隨着勝利搬了一間幽居的家，沒有回東北，也沒有恢復自由，却弄到台灣去住了。這些事在東北人的心眼裏難免感覺到不平，再加上接收以後的壞現象，於是他們在苦熬十四年後大大的失望了。

共軍在東北的地下活動，在僞滿時期受着嚴密的壓迫，當然表現出來的不能是多少萬的大軍，和遍地是轟轟烈烈的事蹟，可是他各地有細胞，得到了蘇軍出兵東北的機會，自然會發酵成長。政府也忽略了這一點，受了敵僞「王道樂土」的宣傳，認爲東北已經被敵僞澈底控制了，那裏不會有中共領導的地下軍。因此開始寄幻想於「外交接收」，未能在事實上多做準備與處理。到杜聿明率軍出關，所向無敵，政府似乎更加重了自已的錯認事實的信心，以爲各地來的水旱八路和臨時收集起來的土八路，絕沒有作戰力，不入哈爾濱是顧及到外交問題，並沒有把共軍的戰力放在眼裏。那知道共軍步步後撤的結果，使國軍力量分散了，他們回到北滿倒有了生息教育，消化整理的機會。地下一切細胞當他獲得陽光與水分以後都有了作用了，領頭帶路，收編僞軍，一切都比遠征緬甸的南方美械部隊來得方便與有力。

因爲根本忽略了東北兩個特殊的主要因素，開始就錯了。由於這種錯覺與認識，就演變出不少的錯誤，到現在才漸漸的有人發現。「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要想扭轉現局是不容易的。可是還有人說，當時杜聿明全盛時代，政府要再給他增加上三五個軍，蕩平東北是不成問題。這也只能做一種「非戰之罪也」的自我陶醉，其實積勢的造成並不是從陳誠出任北平行轅開始。

積勢的造成與挽救

國軍積勢的造成，除了基本上，忽略了東北的兩個特殊因素外，在接收後人心的喪失上也是主要原因，如果單從軍事上看，那末一九四六年的國軍冬季攻勢是優劣轉換的分水嶺。好大喜功的杜將軍深悔沒有打鐵趁勢，打下長春後，一氣攻下哈爾濱。在一九四六年冬天爲準備次一步驟，剷除側背威脅，在零下三十多度的惡劣氣候下，發動了一次冬季攻勢，結果折損了近二十團的兵力；於是失去了相持的平衡，以後只能據守點線，應付共軍一次又一次的進攻，到五次攻勢時他已經力竭聲嘶了，而且患着病，由熊式輝代爲指揮，勉強算是又撑過一次。據說起初熊杜之間不甚相洽，後來因爲內外憂患，東北頹勢已經表面化，中央爲挽回頹勢，要調整東北軍政機構，兩人同時下台之前感情倒好起來，現在友誼更篤，在東北危機中，他們談起東北問題來，都相互吹噓與標榜。

中央打出一張王牌，教參謀總長陳誠出主東北行轅，周福成，王鐵漢，侯鏡如，安春山等軍先後奉調出關，來應付共軍的二次攻勢。周王侯等軍都在臨陣之時吃了虧。陳總長「不使共軍有第七次攻勢」之豪語，竟成了一句空能不說確保東北的決心。保到那一天，誰也不知道。所以當元老們不得要領臨去的前夕，中央雖然奉送國府顧問最高的名義，也只有敬謝不敏了。

這一切的一切，只說明一點，『打不下去了』。中國人看得清楚，美國人當然亦看得清楚。中國政府着急，美國政府亦着急。這局面不是五億七千萬元可挽救了。這或者說明了和諧之所由來。

蔣主席廬山之行共十九日，據說是在統籌全盤大計。傳說最高當局返京之後。便告誡部屬說：『打幾個敗仗就消極了嗎？』這一句話就說明了領袖全盤考慮的結果，亦說明了今後的時局。『打不下去了』，還得打下去。和議算是過去了，今後一切到底必决於戰局，目前戰局的重心當然在東北。東北的關鍵當然在瀋陽的得失，據最近瀋陽來人談，那裏的糧食燃料還有一個月的儲備。那麼就是說至少還可以支撑一個月，加上空運補給，支撑到三月廿九日大選過去，當可沒有問題。

過了大選之後又該怎麼辦呢？首都目前流行一種揣測之談，說蔣主席在山會考慮到副總統問題。大總統萬一出巡，副總統有代理之責，這關係非同小可。這本來是中國內部的事，但在美國關切中國問題，而中國依恃美援的今日，美國對中國的內政似乎不肯漠視。於是伴隨着和諧之來，京中傳說美國對於李宗仁競選副總統問題，也頗重視。就是說，萬一大局眞到了不可收拾的時候，李宗仁或者是一着可走的棋子。這在我們看來，只能算是人民煩悶中一個揣測而已。和議既不能成事實，將來的一切仍是只有在戰場上見分曉的一條出路。

提高稿費

（第十三次調整）

本刊稿費自三月十六日起，每千字致奉國幣二十萬至三十萬元，此啓。

話，不，簡直成了「語識一，以後的共軍攻勢，是分不開次數了，是連續不斷的疲勞進攻。共軍在東北的野戰部隊有十五個縱隊的番號，就是沒有大會戰時，也是採取空心戰術，在北滿腹地不留什麼軍隊，而以所有的部隊都放在前方，採取三三制的輪流進攻，以五個縱隊在第一線進攻，五個縱隊做預備隊，五個縱隊整補，輪流使用，使得國軍得不到片刻休息。

陳總長同東北國軍各部的歷史淵源不深，他想從他的魄力和資望去扳轉東北的頹勢，新官上任三把火，一去的時候氣勢很壯，住辦公室，微服私訪，鬧的很兇，硬把守四平街得勳的陳明仁給他一個「撤職查辦」。滿以為拿着上方寶劍大幹一翻，可以振奮民心士氣，那曉得頹勢已成，驕兵悍將是無法控制的，結果適得其反，軍心益加渙散，士氣更為低沉，人民在飢寒交迫下，也沒有方法振作起來。

陳明仁雖然經陳總長撤職查辦了，但是南京方面始終沒有發表同樣命令，陳明仁仍以守四平名將悠遊京滬，回湘掃墓，他撤了他的職，另外還有人在捧他的場。上方寶劍如此不靈，被東北國軍將領看穿了，覺得他既無德可懷，復無威可畏，因此指揮上自然要發生不少的困難。特別好強的陳總長，在這種情形，肝火激盛，胃病復發，內外夾攻，使他沒有方法呆處。當新五軍被共軍解決後，蔣主席飛瀋陽，軍事檢討會上陳總長同廖耀湘，當面頂嘴，廖竟說，「我只有一個錯誤，就是聽從了行轅的指揮。」到不可開交時，蔣主席將一切自已承當起來，回到南京，一度傳說杜聿明將東山再起，後來才選定了同遠征軍有點淵源的衛立煌來做陳的替身。共軍在他的優勢地區是一點也不放鬆的緊打，當頭棒一棒棒的向衛立煌打來。給東北華北兩戰區打補綻的范漢傑兵團，鑒於過去九十四軍急進增援東北的吃虧，而自已手裏的本錢又有限，所以登陸以後，兵力不敢分散，大部隊集結着徘徊於長城線內外，不敢向前猛進，這一個鬆懈的補綻，也給東北使不上一點勁。因之衛立煌所感受的壓力一天天的加大，於是鄭洞國飛京報告，東北平津和在南京的元老，看到了東北的嚴重危機，不能再沉默了，開會，請願，發出了一片求救的呼聲。

請願團是治喪委員會

東北元老們的奔走呼號，事實上並解決不了什麼問題，不過是更具體的說明了東北問題的嚴重。就是現在把他們一個個的起用了，也不能收拾東北人心，扭轉整個局勢。所以有人諷刺他們說「東北請願團就是東北治喪委員會」。話雖然有點過於挖苦，事實上也有點像那末回事。

在京的東北元老莫德惠劉哲和天主教的于斌等首先與政府要員接觸，嚷起了這個挽救東北的問題，北方平津的東北的元老們，也銅山西崩洛鐘東應，陳總長分電平津兩市長轉請張作相萬福麟馬占山等來京，他們一時活躍起來，張作相自津來平，行轅李主任也幾次邀宴他們詳談，經過十多年憂患的張作相說話是很謹慎，馬占山比較火氣最大，因為他是抗日英雄，而且勝利後又到東北受了一年的罪，他說他不知道政府究竟對東北是個什麼策略。他們松北綏靖總司令，始終還沒有見諸政府明令。

張萬馬諸人飛京請願之後，接着東北還有一批批的人飛進關來，名義都是到京請願。有的人是治喪，有的人是送殯，請願者似乎也說不出一個中心主張來。要兵要糧還用說嗎？兵糧在那裏？如何運送？政府對東北要有辦法，也不會遲誤到現在。至於說組織地方自衛武力或編游雜部隊，那也是空話，元老們早已與下層脫節，誰會聽他們的呢。而且游雜部隊都是已被兩方收編過了，現在沒有什麼游離在兩大勢力以外的武力。組織地方武力，也不是一兩天可以做成的事，緩不濟急。除了幾個大城市，沒有面線和鄉村，城裏人是不當兵的，組織地方武力根本無法着手。即使請願團不是治喪送殯，也不過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垂死呼喊。

東北問題可能發展

東北問題已不能在東北求得解決，重心逐漸南移，二月中旬北平成了注意研究東北問題的中心，元老們與華北軍政當局接觸頻繁，有一點像九一八事變以後，也有一點像勝利接收東北之前，但是性質上與前兩次都不同了。他們在這裏嚷了一回，又先後到南京去，向中樞有關部門洽商請願。參政會駐會委會廿八日通過王化一莫德惠于斌等提請政府迅速增強東北保衛戰辦法。可以看做此一問題的總結。所謂全面支援東北也不會超出那七項辦法──（一）迅派重兵增援，（二）以切實有效方法樹立地方武力。（三）認眞促進策反工作。（四）積極推動戡亂動員。（五）擴大糧食空運。（六）從速恢復瀋錦交通。（七）組訓難民準備還鄉。這七項原則性的辦法，雖然是東北參政員提出來的，也可以代表政府那一方面的意思。迅派重兵增援，聽說政府決加派五個師到東北參加作戰。至於樹立地方武力與推動戡亂動員，現在根本地盤有限了，似乎是無地可做，時迫勢急也無時可做。認眞策反，由誰去做呢？戰亂兩年，除了郝鵬舉來回走了兩趟，又被捉回去，還沒有任何地方見到政府策反的成效。東北共軍儘管有不少舊東北軍的幹部，就是他們反過來，也帶不過人來！那有什麼用呢？擴大糧食空運是必要的，瀋陽民食不管，軍糧也只能維持到四月裏。恢復瀋錦交通須經過幾次惡戰，打通後修復也不容易。組訓難民還鄉，從蘇北就開始過，那些沒落的地主都是吃現成飯的，要他們打回去嗎？他們一定要後悔的說：「要知道這樣還不如不出來好」。天主教的新遼東十字軍，雖然有人在醞釀，一時也不易出現。這個七項辦法中沒有提到起用東北元老，但是內中曾暗示出來，某些辦法的執行，須由東北元老負責。不過元老們多半是眞正老了，與下層已經脫了節，現在把他們請出來，也只能有一個作用，責任是大家負了，免得他們以後多嘴嘵舌。

營口已陷，遼南盡入共軍掌握，白崇禧部長宣稱東北戰略無變化，守東北以保華北。東北怎樣能守得住呢？據熟習東北情形的人說，現在國軍在東北的作戰，還不僅是兵糧械彈的問題，更可慮的是軍心士氣，衛立煌登台後，已經槍斃了一個放棄陣地的師長了，聽說營口市區內也沒有經過劇戰。怎樣團結軍心振奮士氣呢？有的人主張嚴刑峻法，幹掉幾個貪生怕死的；有的主張想法打幾個小勝仗來振奮一下。看樣子兩者都不容易收效。白部長所謂東北戰略無變化或許就是將有變化的先聲。國軍想不放棄東北，還願意而且有力量向那裏繼續軍事投資，也只有兩條路，一個是固守吉長四平瀋錦，重新打通北寧路關外段，一個就是撤退吉長四平瀋陽，以錦州做基地，肅清冀熱遼邊區，控制熱河，一方面還算楔入東北一角，另一方也可以用冀熱遼邊區封鎖東北共軍，使他竄不進關來。但是這裏有一個問題，丟在敵後的據點，突圍太不容易，揹在身上的包袱，沒有方法將他解下來。

放棄吉長，東北當局確嘗一度攷慮過，但是在當地守軍方面他們不願意這樣做，他們覺得在那裏雖然相當苦，可是突圍危險更大，說是沒有戰略上的作用罷，但起碼還可以牽扯共軍一部分兵力。因此最後還是決定了不放棄。誠如鄧文儀局長所說「目前戰事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問題。」要攻要守都需要看實力如何。

有人在想，東北這塊土地是東方的巴爾幹，日俄兩個在那裏流過血，今後也或許還有另外的兩個國家在那裏幹起來，國軍不必放棄東北，撐下去可以等待國際上的新局勢。這未免過於「自卑」，也太天眞了。假設吳佩孚還不曾死，不知他將怎樣「北望滿洲」。

共軍在陝北陝南發動攻勢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西安通信）本刊三卷二十二期「豫鄂川陝邊區態勢」一文曾謂：「共軍爲應付國軍收復晉南的戰略，必將在陝北發動攻勢」。此一預料，業已證實。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時，晉南的共軍王震部由東禹門西渡。截止目前止，已經渡過來的有四個旅左右，他在消滅了禹門的保安隊一大隊之後，攻勢的箭頭指向關中門戶—韓城，另一支兵力會合原在黃龍山區的共軍教二旅、獨立旅、黃龍支隊、及宜川支隊共萬餘人，直逼宜川—延安的右臂膀。共軍發動這一次攻勢，事先是可以料得到的。上月中旬，彭德懷、賀龍的部隊已經在米脂、綏德一帶集結了八個旅的兵力，一般估計將會對榆林發動第三次攻勢。榆林的鄧總司令寶珊，爲了要求馬鴻逵支援，還親自飛寧夏，當面請益。這些部是爲了準備應付共軍的榆林第三次攻勢，因爲截止現在，馬的部隊到陝西來的只有兩個師左右，担負陝北防務顯然是不夠的。

此時此際，共軍對陝北發動了攻勢，一般人說他是春季攻勢，目標在延安。其實我們應該作如下的判斷：反攻延安不是他主要的目標，僅僅是一種手段，主要目標還是要集中優勢兵力打擊國軍的有生力量，尤其是要跟新的生力軍—寧夏兵團碰一碰。共軍在西北作戰的戰略目的，顯然不同於東北或華北。在東北，共軍有攻城拔地的打算，而在西北，他還沒有攻佔據點的必要。延安這個包袱既然由國軍揹上了，共軍方面又何必搶這個包袱來揹？所以說攻城池僅是用來消滅對方有生力量的手段。

現在大戰在宜川、洛川、韓城之間進行，安邊在米脂、綏德、清澗的共方主力還沒有積極行動，採取的是兩面看管的形勢，北面看着榆林，南面管着延安。據說在陝甘邊境有一股兵力不小的共軍，在保安縣發動了攻勢，這一行動，可能是牽制三邊的寧夏兵團的增援行動。

陝北的戰鼓已緊，同時陝南也告警了。原來由陝南竄鄗西、鄖縣的孔從周、趙壽山部，爲配合陝北的攻勢，又回到了陝南來。這條路是一年多以前李先念走過的。國軍對這一地區很注意，因爲他北上可以威脅西安，南下可以威脅四川。現在共軍在陝北，陝南遙相呼應地行動起來，決不是以前的一種騷擾攻擊了。三月三日是祝紹周主陝四週年紀念，這般形勢，也夠傷腦筋了。

喧嚷了很久的川陝甘聯防事，現在已經具體。陝省府祕書長林樹恩（川人）於春節前啣命飛成都，與四川當局商談很久。決定在廣元成立指揮部，轄安康、鎮坪、嵐皋、鎮巴、漢中、寧羌、廣元、城口、萬源等二十七縣。司令人選傳說中有青年軍二〇三師師長潘華國、七十九師師長方靖、和現在廣元的黃鑫少將。林樹恩氏已回陝，四川省保安副司令王元暉同來。王來係與胡宗南洽商兵力如何配備。川陝聯防在成都報紙上登載得很熱鬧，而在西安，當局諱莫如深，當作是一樁祕密的事。其實知道的人也不少了，因爲胡宗南的新聞政策是無條件的封鎖，新聞記者也懶得去自找麻煩。

白崇禧三月一日在中樞的軍事報告，關於西北部份，很引起此間一般人的注意。因爲白氏談到西北時，滿口稱讚馬鴻逵的騎兵，而對胡宗南一字未提。事實上，胡宗南在西北十餘年一直是主角地位，現在忽然變得默默無聞了，元旦授勛沒有他，這次白部長也沒有把他算做西北的安定力量，在大誇了馬家軍之後，緊接着說只要指揮能夠統一，西北就無問題了。由此很明顯看出來，一且西北軍事統一指揮，胡宗南只能担任配角，這在一生好勝愛強的胡將軍是不能忍受的。他的出處，始終未見官方有任何方式的透露。西安的人雖然不相信他離開這十餘年來經之營之的西北，可是形勢逼人，非離不可。最近因爲豫西的陳賡，又有由方城舞陽向北移動的趨勢，胡的在晉南的第一軍又抽調了一部份回來。据說政府已放棄要胡部北上的打算，而希望他能集中兵力在豫西，並重整豫西團隊，編成一支機動兵團，控制住豫西，東可馳援平漢，西可屏障川陝，而他本人或將駐節洛陽。但這也不過是傳說而已。

西安謠傳毛澤東本人已回到陝北來親自策劃攻勢，使很多敏感的人感覺到共軍企圖不小。可是無人相信陝北會是今後戰局的重心。看共軍的戰略和政略，西北也許永遠是一個牽制性的戰場。觀察記者不是說過共軍今年的戰略是：「突入江南，號召東南，影響西南」嗎？（三月二日）

觀察通信
歡迎投稿
每文請勿過長，最好在三千字左右。

（上接十三頁）在那裏，辦理聯絡工作，我當時想留在那裏，但細細一想，總覺不妥，不得自由出來，與家裏通不到信，總放不下心，所以一個人也沒有留在那裏。撤退前夕，他們擺了二十席上等酒席，爲我們餞行。在行署主任向我們致歡送詞中，他說明他們將誓死與國民政府打遊擊戰。

次日，本定清晨六時動身，因有兩大卡車在蘭封被俘的俘虜要我們送回商邱，所以等到九時許，大隊汽車始離開荷澤。一路之上，經過定陶、曹縣以及許多大村莊，都被民兵（即所謂土八路）留難檢查。他們明明知道我們是行總的，但仍對倉庫和工作隊的工作人員，連行李都要檢查。雖然行署派一樓翻譯官送我們，帶了行總和軍區的放行護照，沿路的民兵仍不理睬，仍是留難檢查。所以那天我們到商邱時，已經半夜，我的汽車在越過鐵路時，還遭國軍射擊，那夜我們的一部份汽車都在車站以南圍子外面過夜，我足足餓了十八小時。還有一部份大卡車陷在「隴陽界」的深水公路內，直到天亮後，始用十輪大卡車去拉出來。

我在荷澤解放區所見的情形，寫到這裏爲止，當然這是解放區的一角，決不是全部。我在荷澤本有詳細的日記，此刻卻不在手頭，所以只憑回憶，平鋪直敍的寫出，掛一漏萬在所不免。（完）

如欲避免漲價
仍請早日定閱
觀察叢書
三月底預約截止
四月中開始出書

爐邊天下

無獨有偶

費孝通

和觀察的定寫「爐邊天下」時，我自已拿定主意不用翻譯充數。其實秀才家裏坐，他所知道的天下事，無非是外國雜誌上的二手材料，不過比別人勤勁一些，肯在圖書館雜誌櫃旁邊多站一些時間罷了。這既是閒談性質，所以也不必引經據典，加上註脚，以明出處。可是這次却要破例了，原因是如果我不用翻譯方式，恐怕讀者會疑心我在指槐駡桑，甚或誤會希臘是東方某國的別名。這不是寓言，除了覺得「爐邊天下」中應該包括一篇地中海古國的近況之外，我對本譯文也可說別無其他含蓄的意思。

這是美國紐約 Nation 周刊今年第一期所登載的歐洲特約通信，出自該刊副編輯 Del Vayo 之筆。這位先生在巴黎，信是去年十二月二十八寄出的。以下是他的話：

× × × ×

關於希臘當前的局勢，除了左右偏見的報導之外，簡直什麼都不易得到。因為這個原因，我很高興能在這裏給 Nation 的讀者轉述我和一位剛從雅典來此的中立的高級官員的談話。我和他相識已有多年，他的能力和誠實我是願意担保的。

談話裏我發覺他對於那些在雅典的英美同僚們所具缺之現實的態度相當驚異，他們還相信假如華盛頓能幾億幾億的援助希臘，而且行動得迅速，整個希臘問題在幾個月裏就可以澄清了。在這位官員看來，除非美國遣派遠征軍，不是幾團海軍陸戰隊，局面是變不了的。「這已不再是援助希臘政府的問題，」他說，「而是整個代管的問題了；不然就該承認失敗，重新開始考慮怎樣才可能獲致希臘內部的協調。但是我怕這已經太遲了。」

雖則我已讀到過不少關於希臘官場的貪污和無能，我聽到他告訴我美國送去百萬百萬的金元的下落時不免出神了。巴黎報紙曾重視希臘游擊隊軍備比政府軍為優良的事實，但是我們必須知道確實數字才能瞭解游擊隊所占的優勢。據我這位朋友說這是政府軍最近吃虧的主要原因。美國送去了巨款但是政府軍的裝備却和一年前一樣的壞。例如：應當有六十挺機槍的隊伍却祇有十挺，其餘的五十挺並沒有買來。但是他堅持說，更重要的原因是軍隊士氣的低落。當前的社會情況並不能鼓勵一個在政府方面的人為他的國家而死。

在希臘，發了財的官吏和黑市的老闆們的生活和其他人民的生活之間的懸殊比歐洲任他其他地方為甚。希臘的貪污繼承着五十年巴爾幹對會傳統一切的惡習。在雅典，祇要有錢，可以得到巴黎黑市上所不易見到的珍品。我這位朋友又說，舞場酒館將繼續熱鬧到游擊隊攻進雅典的那天，假如有那一天的話。顧客大部全是希臘人。在 Salonika，情形更可恥了。豪華的顧客得在乞丐和赤脚的兒童的隊伍裏擠出來踏進奢侈的飯館。「簡直令人難受」我這位朋友說；「我曾親眼看見從前線回來的軍人搗毀這種地方，打破桌子，驅散顧客。」關於政府的恐怖政策他祇證實了 Nation 周刊以往的報導。

另一方面說，單從軍事觀點看，這是個能消耗比現在政府所能支配更多軍隊的戰爭。我這位朋友好幾次聽到曾在大戰中在同盟國方面作過戰的軍官說，他們寧願和德國正規軍對壘，而不願和十幾個游擊隊遭遇。這些游擊隊「像蚊蟲一般的在你知道之前已在你頸項裏狠命的叮了一口。」游擊隊還能依賴一部分人民的支持。我問他關於鄰國接濟游擊隊的情形。他說：「當然，大家知道他們從別處得到供給，但是有什麼辦法呢？誰也阻止不了。邊境上的情況使任何限制都歸無用。」

我問他關於由各國有名的軍人所組成的聯合國的管制委員會的情形。他回答說：「他們已不復能活動了。你豈不知道 Salonika 已是個圍城了；雅典市外幾里就有被游擊隊射擊的危險了麼？政府治下的區域一天比一天縮小了。」

在我們分手之前，我這位朋友問我關於西班牙的情形。我告訴他說，「幾個月裏，將有第二個希臘出現。華盛頓和倫敦還沒有聽我們的警告；他們口頭上雖則不贊成佛朗哥，他們還是把他看成反蘇堡壘，是西方戰線的一部分

在幾個月裏，他們就會知道了；希臘游擊隊的成就已影響了西班牙，當地游擊隊已更形活躍；西班牙人民已得到結論聯合國和華盛頓都不能幫助他們，準備着自已打一條出路。」我們同意，如果要有效的玩強權政治，單靠工業生產力，金錢，和強項是不夠的。同時需要對別國的人民和我們所處的歷史時代有一點認識。

× × × ×

Del Vayo 的通信以此為止。

同期的 Nation 裏還有一篇關於希臘的評論，沒有具名，是編輯自已寫的。我想也不妨節譯幾段附在這裏。

× × × ×

臘鼓聲中，希臘的展望在這該國多難的現代史中沒有比現在更壞的了。橫在希臘人民面前的祇有恐怖和流血，這已經繼續了十一個年頭。希臘自由主義者的消蝕，（令後的歷史家會把大部分的責任歸罪於美國國務院）留下兩種力量在伏臥的尸體上爭逐——共產主義者和保皇法西斯主義者。

游擊隊是被困住了。他們不能獲得權力，因為他們共產黨的領袖已不能發動廣大的羣衆行動。他們也不像能在北方獲得大量有效的軍事援助——不是那象徵性的「國際支隊」——足夠他們展開決定性的進攻。如果他們眞的威脅了 Salonika 或是雅典，將要和美國軍隊接觸，將是戰爭。這是不太可能的。我們相信大部的折衝將在聯合國會場裏，蘇聯將再作希臘人民的「戰士」。

保皇法西斯主義者並不想把游擊隊消滅，祇想困住他們——像他們在過去十五個月所做的。如果游擊隊全部掃清了，美國的援助也會停止，誰再來喂養和保護這些保皇黨呢？（這事實部分可以回答若干去夏來希臘考察的美國國會議員的問題，為什麼十二萬正規軍不能應付二萬游擊隊。）同時，政府不願武裝農民去自衞，怕這些山地裏的農民抵抗了共產黨之後會把槍口轉向現在統治希臘的「漢奸」，和剝削他們的人物。

× × × ×

我在這裏不妨提到一段最近馬歇爾在國會辯論援華問題時答覆議員的質問。美國新聞處二十日電中有下列一段報導：「伊里斯詢問：希臘與中國之局勢是否相同？馬歇爾答稱：局勢甚不相同。渠說明在中國吾人有一已與政府作戰相當時間之軍隊，在希臘吾人有一正由鄰邦支持之侵略勢力。共產黨軍隊自中國之外獲得援助一點，並無證據。」無獨有偶這題目，依這樣說來，可能是不正確的。但是馬歇爾的說法，在共和黨人如塔虎脫之流看來，是歪曲了事實，在中國，也有人恨不得和希臘並提。於是中希是否係難兄難弟，我也不必在此作結論了。

二月二十四日於清華勝因院

論神境

曹覺民

文藝上的神境，就是哲學上的本體（Noumenon），也就是宗教上的上帝。因爲它超乎人類理解之上，所以很難加以說明。但人類是富於好奇心與求知慾的，往往企圖在不可能中建立可能，所以這個問題仍爲一般飽學深思之士所注意。不過關於它，人們底態度，很不一致。例如科學家態度謹嚴，置之範圍之外，不再探究；宗教家則將其人格化，直名之爲上帝，認爲它是個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的超人格；哲學家則對之特別發生興趣，不惜孜孜探究，津津樂道，認爲它是宇宙萬有底根柢，及其生滅變化的原因。因而就不免產生許多學派：例如說它是物質的，就是唯物論；說它是超物質的，就是唯心論；說它是心物二者合成的，就是折衷論（Eclecticism）以上係就其性質說的，關於其數目，也有幾種學派，例如說它是一個的，是一元論；說它是兩個的，是二元論，說它是多數的就是多元論，不過此處所謂二元論，也就是折衷論，神者原來是二而一的，並沒有什麼分別，專門探討本體的學問，在哲學上名本體論，本體論與宇宙論同被稱爲純正哲學，以之別於關於人事的實踐哲學。

文藝上的境界，就我歸納，約有九種：其超乎人類理解之上的，爲神境、靈境與妙境；其逸出人類理解之外的，爲幻境、夢境與絕境；其在人類理解之內，且爲人類意志所能控制而表現的，則爲意境。意境有三種，就是化境、勝境與眞境。

科學本身是知識，而哲學則不限於是知識（Knowledge），而是智慧（Wisdom）。因知覺（Perception）到相當深度，才是理解（Comprehension），理解到相當深度，才是智慧，而妙悟、徹悟與頓悟，均爲智慧，故智慧爲高度理解，而境界則爲高度理解之形象化。

境界是高度理解底形象化，而高度理解本身則爲文藝底內容。因此，所謂內容，也就是智慧。人們將自己對於宇宙人生所特有的妙悟，藉具體的題材表現出來，就是文藝。因此我們可以說，境界是內容透過題材產生的，內容是抽象的，可思的，裸露的；題材是具體的，可感的，含蘊的。同一題材，人可對之作不同理解，由於理解不同，同一題材卽可發生不同的意義。換言之，不同理解透過同一題材，可使之產生不同內容，反之，不同題材透過相同理解，也可使其發生相同意義。題材是你創作些什麼？內容呢，則是你爲什麼創作？所謂文藝，依我看，就是使用語文來表達動人境界的藝術。

用某種哲學觀點說，世界有兩個：一爲可感界（Sensible world），乃感官之對象；一爲可思界（Intelligible world），乃理性之對象。所謂抽象的（Abstract），也就是可思的（Intelligible）；所謂具體的（Concrete），也就是可感的（Sensibe），而文藝所用媒質（Medium），都是具體的，也惟其是具體的，才爲感官底對象。因此當作家塑造風格與描寫景物的時候，不妨運用高度技巧，在感官之前，使所表現的境界盡量淸新、鮮明與生動，因爲生動、鮮明與淸新爲任何文藝品引人入勝的必要條件，也惟有具備此條件者，才能使藝術底效力，透過感官，入於心底使欣賞者一詠三歎，玩味無窮。

大體說來，科學家所研究者爲可感界，其特點在能實驗證明（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也惟其是可感界，才能實驗證明；哲學家所探究者爲可思界，其特點在能自圓其說（Self-consistency），因其爲可思界，也只能自圓其說；文學家則在將可思界變爲可感界，故常運用具體媒質，表現動人境界，其特點在能使人形神俱釋，物我兩忘，而得到神祕的陶醉（Mystical exaltation）。

人類伸張其智慧的觸角，探索到宇宙底本體，又將此種探索的結果，用語文表現出來，就是本文所說的神境。神境雖然不是文藝上最好最動人的境界，卻是作家們最難於表現的境界。中國道家總算是善於描寫本體的了，例如本體是可思的而不是可感的，所以「老子」上說：「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旣。」本體爲宇宙萬有底根柢，所以「老子」上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本體是難以用語文說明的，所以「老子」上說：「故強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本體雖然是抽象的，但卻將一切具體的包羅在內，所以「老子」上說：「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雖然如此，但仍不能予人以生動、鮮豔與淸新的印象。原因不外本體是宇宙本質（Primal Substance），世界原料（World-stuff）是可感界底終極因（Ultimate cause），是因果律底最初因（First cause），其性質爲絕對的，不變的，自存的（Self-existent）無限的，根本的，永恆的（Eternal）可思的，迹先的（Apriori），所以才這麼難以刻劃與描寫。

中國文學家中，舉幾個例說，陳子昂就曾理解到神境，因他曾說：「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念天地之悠悠」，就是他已經感覺到神境底空闊與玄邈，因而愴惑莫名，於是，就難免要「獨愴然而涕下」了。陶潛對於神境，態度比陳子昂和緩些，他並沒有因愴惑而哭涕，不過也感到無可奈何罷了。例如他說：「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屈原不及陶潛豁達，而熱情則過之，俯仰自問，深感於自己的渺小，所以說：「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吾不及知兮，來者吾不聞！」（遠遊）王羲之底態度，比較他們都堅定，因爲他並沒有因神境底空闊與玄邈而喪失自我，所以才說：「大矣造化功，萬物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莫非新。」（蘭亭詩）

宇宙乃時空之和，而本體則爲宇宙之母，與神境相比。試想人之爲人，就體積說，是多麼渺小！人之一生，就時間說，又是多麼短暫！卽令如此，但依然有不因神境之偉大玄邈而忘卻自我重要的人，反而以爲可以擴大自我而使其成爲神境，或以神境可因自我之努力而發揚光大，於是，遂由神境而入於靈境。

敬悼甘地先生

陳夢家

也許甘地並不是神，
他只是愛心超卓；
也許甘地並不成聖，
他只是醇然一無造作；
也許甘地只是一個平常人，
爲他的死，我們更要痛哭。

他一再情願餓死，
來解脫兄弟們的仇隙；
他情願喪失自己，
不叫無辜的人流血。
讓我們記得他臨終的教誨：
「請寬恕憐憫凡人的愚昧！」

三十七年一月卅一日淸華園

編者報告

自本期起，每份售二萬五千元

讀者先生：我們又要加價了，自本期起，每份售二萬五千元。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這次加價加得太快了，剛剛四卷一期才從一萬元加至一萬五千元，現在四卷三期又要加到二萬五千元；加得委實太猛了！事實上，上一期我們就要加價的，不過不好意思加，所以忍住了一期。陰曆年關一過，在短短一個月之間，想不到紙價猛跳得這樣利害，現在每令賣到四百萬元。紙價的上漲使辦刊物的人都透不過氣來，（因爲刊物大都沒有配紙，或雖有亦爲數甚微）雖然不願加價而到頭還是不得不加價。

經濟日窘的兩個原因

我們近來越來越覺得經濟困難，兜不過來。譬如我們這次在休刊期間，徵求定戶，結果很不壞。編者在四卷一期報告時，就已增加了一千六百名，到今天（三月九日）止，實際上增加了三千二百多名（定單號碼自1441升爲17618）。增加了這末許多定戶，照例應該有一筆爲數可觀的收入，但是社裏每天還是沒有錢。錢到那裏去了呢？錢都拿去買紙了！可是買了多少紙呢？可憐得很，前後一共祇買了二百令紙！祇夠五期用。我們看到這個情形，眞是替本刊的前途担憂。我們是完全靠業務收入來維持的。照這個樣子下去，我們何以爲繼呢？形成這個困難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刊物加價和紙價上漲的比例，其間的距離越來越大。譬如我們在創刊時，每份售五百元，每個定戶先收五千元，那時的紙價是二萬五千元一令，這就是說，賣掉了五十份刊物，就可以買回一令紙，收到五個定戶的訂費，就可以買到一令紙。現在，照上次一萬五千元的售價，要賣掉二百六十多份才能買回一令紙，照前次十萬元三個月的訂費標準，要收到四十個定戶的款子，才能買到一令紙。讀者試想，五十與二百六十，五與四十，這個比例的距離多大！這就是說明爲什麼我們最近在經濟上越來越感覺困難。但是售價能否跟着紙價上漲的比例上漲呢？大家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沒有印上黑字的白紙，是商品，一旦印上了黑字的書刊，就是文化品。在這個年頭，文化品是最賣不起錢的！

另外一個同樣重要而使我們陷入困難的情形，就是我們所用出去的錢，如買紙、付印刷費、付稿費、員工開支等等，都是一筆一筆現款先付出去的。即以買紙說，貨款均須當日付清，一個錢也少不得，一天也拖不得。但是我們在收入方面呢？除了定戶預收以及外埠一部分同業先期匯款以外，還有一部分同業，特別是上海的同業，都要到三十幾天甚至四十幾天才給我們款子。（譬如一個月結一次帳，再加上給我一張半個月的期票，就等於四十五天以後才付款）在目前這種物價的波動下，一個月或一個半月以後才付錢給我們，那就等於使我們一個錢祇收回了半個錢。現舉一例言之，去年代我們在北平發行華北航空版的新貿書店，雙方雖然訂了契約，但該店從來就沒有按約付款，越拖越多，到現在止，還欠我們八千萬左右。更早不必說，就說在陰曆年關以前，他們要是能將這筆錢付給了我們，我們那時可以買五十令紙，現在即使付給我們，我們祇能買到二十令紙，請問這筆損失怎麼交代過去？所以，從第四卷起，我們對於外埠同業絕對不再放帳；要我們放帳就等於要我們自殺。外埠同業假如希望我們按期寄刊的話，務請將書款先期匯下。同時，本埠一部分不能迅速結賬的同業，我們也祇好停止發書。我們固然願意和同業合作，但我們也得顧到自己的生存；這點苦處，請大家原諒。

關於定閱的兩點報告

關於定戶，有兩點需要報告。第一，由於物價的波動和幣值的貶落，事實上使我們已不能接受定戶定閱六個月了。因爲四五個月以後的物價，我們簡直無法估計，收了訂費後又不能加價；我們現在在定戶方面，已經虧折很多，所以讀者定閱，以後即以三個月爲限。

第二，許多讀者常常尚未滿期，即來續定，盛意固然可感，不過有時似乎未免續定得太早了一點。譬如現在還祇是四卷三期，但有位讀者，要到四卷十七期滿期的，已經寄了款子來從四卷十八期起續定下去了。當我們還祇出到三卷十幾期時，已有讀者從四卷四五期起續定下去了。這種訂費，不收吧，有些辜負讀者的好意，使他們掃興，收吧，則我們一方面未免太吃虧了。譬如以前有好幾位讀者，都是在三卷十幾期時，即以六萬五千元從四卷四五期起續定三個月的，但現在每册售二萬五千元，六萬五千元祇能看到兩期多，而我們却要送他三個月十二期，明明是虧賠的。讀者或者以爲，我們預收了訂費，可以預先買紙，其實並不盡然。紙容可先買，但其他開支如印刷費、稿費、員工開支等等，都是無法預先「囤付」的。所以從今後起，讀者續定，請勿太早，等到祇有兩三期時，才來函續定，否則我們祇得將寄來的錢暫時收下，代爲保存，到他滿期時，再照當時訂費計算，替他續定，因爲不是這樣的話，我們未免吃虧太多了。以上兩點，爲了本刊本身的營養和健康起見，不得不如此，尚希讀者多多原諒。

合訂本出齊，特價半月，售完不再重印

合訂本第一第二第三三卷上下册共六本，現均已出齊有售，現特發行特價半個月，在三月底以前函購的，一律每册售二十二萬元（定價三十萬元）。郵費普通掛號每册另加五千元，航空掛號每册另加七萬元。我們的合訂本已重印過好幾次，現在觀察叢書出版在即，事繁人少，所以這一批的合訂本售完後，我們可能不再重印了。全國讀者以及各大中學圖書館需要補購的，務請從速。

舊信袋請不必再寄回

自從我們上次呼籲定戶寄還舊信袋以後，定戶響應極多，已詳四卷一期編者報告。可是現在發生意外的困難，郵局不准我們用舊信袋寄刊，四卷一期用舊信袋寄的，總算僥倖寄出，四卷二期一部分用舊信袋寄的，都一一退回，使我們多了一番手足，改用新信袋後始得一一寄出。郵局旣不准用舊信袋，到我們呼籲定戶寄回信袋的意義全失，所以寄還舊信袋的運動，至此告一段落。我們在此再度向一切寄回信袋給我們的定戶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

特別道歉

我們對於最近一陣懇函訂閱「觀察」及預約叢書的讀者，未能像平日那樣迅速作覆，我們對此十分抱歉。最大的原因是因爲最近一陣，每天的郵件奇擁，大約比平時驟然之間增加了五六倍。我們雖然增加了人員辦理登記事務，其中有一位同仁並且每天都要登記到晚上十時半才休息，但由於信件的過份擁擠，仍無法將每天的信件每天登記完畢。我們正在設法再增加工作人員，以便應付事務上的需要，務使每天收到的信件都能在一二日內登記完畢。對於這意外的情形，務祈讀者賜予原諒。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每册貳萬五千元